



西南财经大学

SOUTHWESTERN UNIVERSITY OF FINANCE AND ECONOMICS

硕士学位论文

MASTER'S DISSERTATION

退休准备对老年福祉的影响研究

Study on the influence of retirement preparation
on the well-being of the elderly

学位申请人 李雅熙

指导教师 严予若

学科专业 社会学

学位类别 法学

分类号 _____ 密级 _____

U.D.C _____

退休准备对老年福祉的影响研究

Study on the influence of Retirement Preparation
on the Well-being of the elderly

学位申请人: 李雅熙

学 号: 218030301003

学科专业: 社会学

研究方向: 社会老年学

指导教师: 严予若

定稿时间: 2021年6月

摘要

随着人口预期寿命的不断增加，当代老年人退休后的预期寿命随之延长，退休人口规模持续扩大。中国社会老龄化速度不断加快以及老龄化程度逐渐加深的现实给公共养老金制度带来严峻挑战。社会抚养比上升、养老金收支缺口不断增大、“未富先老”等问题，在未来很长一段时间将对我国公共资源带来极大压力。对民众个体而言，提前为退休作出规划与准备是避免晚年生活动荡以及缓解社会养老系统压力的有效方式。受制度和文化的影响，退休规划与准备在我国尚未得到足够关注。有鉴于我国人口老龄化的严峻现实，个体层面的老年退休规划与准备将会在社会生活中扮演越来越重要的角色。

本文基于 2017 年中国老年社会追踪调查的数据，对城市老年人口的退休准备议题展开研究。通过构建多维度的老年福祉评价指标体系，在计算老年福祉指数的基础上利用 k 均值聚类的方法，设定“低、中、高”三个层级评估老人福祉水平。在对研究对象的描述性统计分析基础上，构建有序多分类 logistic 回归模型，讨论“储备资金、调整心态、改变生活方式、寻找继续工作的机会、筹划休闲娱乐活动”五种退休准备方式对老年福祉水平的影响；并进一步从社会性别的视角探讨了退休准备对老年福祉影响的性别差异。

本研究的主要发现如下：就研究样本而言，第一，没有退休准备的老年人比例较高，首要退休准备方式的分布差异大，退休准备方式呈现明显性别差异。第二，老年福祉的整体水平较高，男性老人的福祉水平整体高于女性老人。没有退休准备的老人福祉水平整体低于有退休准备的老人；在有退休准备的老人中，首要准备方式为调整心态的老人，其福祉水平相对更高。第三，在控制了性别、年龄、婚姻状况、受教育程度几个人口学变量后，储备资金、调整心态、改变生活方式、寻找继续工作的机会、筹划休闲娱乐活动这几种退休准备方式均对老年福祉有显著正向影响。第四，不同退休准备活

动对老年福祉的影响不同，对老年福祉的影响由高到低依次为：寻找继续工作的机会、筹划休闲娱乐活动、调整心态、改变生活方式、储备资金。第五，退休准备对老年福祉的影响存在性别差异。储备资金、调整心态、改变生活方式、寻找继续工作的机会对女性老年福祉的正向影响显著；而调整心态、改变生活方式和寻找继续工作的机会三项准备对男性老年福祉水平有显著正向影响。寻找继续工作的机会对女性和男性的老年福祉水平的影响程度均是最高，调整心态对女性老年福祉的影响作用最小，而改变生活方式对男性老年福祉的影响程度最低。

基于研究发现，本文提出如下思考建议：我国养老金制度的改革需要向第二支柱与第三支柱倾斜，即：提高职业养老金与个人养老储蓄在老年经济保障体系中的比重；推动和规范养老资产管理业务，开拓老年人就业市场，完善社会养老服务行业；自上而下加强宣传和指导，帮助公众认识退休准备的重要性和相关知识技能；社会政策的制定和实施应具有性别视角，以便有针对性地配置资源，看见老年人的差别化诉求。

关键词：老年人 退休准备 福祉

Abstract

The fact that the aging rate of Chinese society is accelerating, and the increase in the extent of aging combine to bring severe challenges to the public pension system. Planning and preparing for retirement in advance is an effective way to relieve the pressure on the social pension system. Retirement preparation has a positive effect on improving the quality of the elderly's life and enhancing the well-being of these seniors. However, retirement planning and preparations have not received enough attention in our country.

This research is based on the data of the 2017 China Senior Citizens Social Tracking Survey, and we conduct research on the retirement preparation issues of the urban elderly population. By constructing a multi-dimensional evaluation index system for the well-being of the elderly, and using the k-means clustering method on the basis of calculating the well-being index of the elderly, the elderly's well-being is divided into low, medium and high levels. Based on the descriptiveness of the research objects, an ordered multi-category logistic regression model is constructed to discuss the impact of five types of retirement preparations on the well-being of the elderly. And we also target at the impact of the gender difference on retirement preparation on the well-being of the elderly.

The main findings of this study are as follows: First, the proportion of elderly people without retirement preparation is relatively high, and the retirement preparation methods shows obvious gender differences. Second, the overall well-being status of the elderly in the sample is relatively good, and the overall well-being level of the male elderly people is higher than that of the female elderly people. The overall well-being of the unprepared elderly is found lower than that of the elderly who are well prepared for retirement; among the elderly who have prepared for retirement, the elderly who are primarily prepared to adjust their mentality have a relatively higher level of well-being. Third, All five retirement

preparation methods have a significant positive impact on the well-being of the elderly. Fourth, Different retirement preparation methods have different degrees of impact on the well-being of the elderly. Fifth, There are gender differences in the impact of retirement preparation on the well-being of the elderly. Looking for opportunities to continue to work has the highest impact on the well-being of women and men, adjustment of the mentality has the least effect on the well-being of old women, and changing lifestyles has the least impact on the well-being of the men.

Based on research findings, this article proposes the following suggestions: First, The reform of China's pension system needs to lean towards occupational pension plans and personal pension savings plans. Second, need to promote the development of pension asset management, the job market for the elderly population and the social pension service industry. Thirdly, the state should publicize from the top down to help the public scientifically understand the importance of retirement preparation. Fourth, the formulation and implementation of social policies need to fully consider gender factors to meet the targeted diverse demands from the elderly.

Keywords: the elderly; retirement preparation; well-being

目录

1 绪论	1
1.1 研究背景	1
1.1.1 人口老龄化	1
1.1.2 老年群体福祉亟待关注	2
1.1.3 应对长寿风险的现实需求	2
1.2 研究目的及意义	3
1.2.1 研究目的	3
1.2.2 研究意义	3
1.3 研究内容与方法	4
1.3.1 研究内容	4
1.3.2 研究方法	5
1.4 研究创新	5
2 相关概念及理论基础	7
2.1 相关概念界定	7
2.1.1 退休准备	7
2.1.2 老年福祉	8
2.2 理论基础	9
2.2.1 角色理论	9
2.2.2 脆弱性理论	10
2.2.3 积极老龄化	11
2.2.4 生命周期理论	12
2.2.5 养老保障三支柱模型	13
3 文献综述	14
3.1 退休准备的相关研究	14

3.1.1 退休准备的研究现状	14
3.1.2 退休准备的影响因素	15
3.1.3 退休准备对晚年生活的影响	16
3.2 老年福祉的相关研究	17
3.2.1 居民福祉的研究现状	17
3.2.2 居民福祉的影响因素	20
3.2.3 老年福祉的研究	22
3.3 文献评述	23
4 研究设计	25
4.1 研究框架	25
4.2 研究假设	26
4.3 数据及技术路线	27
4.3.1 数据来源	27
4.3.2 变量选取及说明	27
4.4 统计方法	31
5 退休准备与老年福祉的描述性分析	32
5.1 样本基本情况	32
5.2 退休准备情况	33
5.3 老年福祉现状评估	35
5.4 本章小结	39
6 退休准备对老年福祉的影响	41
6.1 退休准备对老年福祉的影响分析	41
6.2 退休准备对老年福祉影响的性别差异	43
6.3 本章小结	47
7 研究发现及讨论	49
7.1 研究发现	49
7.2 讨论及建议	50
7.3 研究贡献	53
7.4 研究不足	53
参考文献	54
致谢	65

1 绪论

1.1 研究背景

1.1.1 人口老龄化

自 20 世纪 90 年代末期，中国开始进入老龄化社会以来，老年人口数及其占总人口比重逐年增长，老龄化速度不断加快，其程度亦持续加深。国家统计局的数据显示，从 2000 年到 2019 年末，我国 60 岁及以上的老年人口数量从 1.26 亿增加到 2.54 亿，占总人口数的比例从 10.2% 上升到 18.1%^[1]。而退休人口作为老年人或者即将步入老年阶段的一个特殊群体，人口结构的老龄化势必会扩大退休人口数量。人口老龄化和退休人口数量的增长将会对我国社会保障体系造成冲击，特别是给公共养老金制度带来极大负担。

我国老年抚养比的加速上升、养老保险收支缺口的逐年扩大、“未富先老”现象、老年就业与养老服务行业发展等问题都说明退休问题需要引起社会的高度重视。在现有的社会保障体系下，对于养老保障问题个体应当承担更大的责任。对于个人和家庭而言，解决好退休问题的一个重要途径就在于退休准备。退休准备是人们在退休之前，为保障自己适应退休生活、保持退休生活质量，在经济、心理、休闲、工作等多方面进行的提前计划与准备。已有的大量研究显示，退休准备对老年人的健康水平、生活满意度、退休适应等多方面都具有积极影响（刘泓利等，2016）。退休准备作为退休前的一项重要活动，其相关实证研究在我国还并未引起广泛关注。研究退休准备相关问题，不仅是为了保证个人老年生活的质量，更是为了减轻社会抚养负担，

^[1]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统计局. 中国统计年鉴[M]. 中国统计出版社, 2020.

缓解社会公共资源的压力，这是积极应对老龄化社会的重要部分，关系到社会的长久繁荣与稳定。

1.1.2 老年群体福祉亟待关注

对于包括众多退休人口在内的老年群体来说，其本身作为生理性和社会性弱势的群体，他们的福祉更应当受到学界和社会的关注。持续增进民生福祉是各国政府共同追求的目标，也是政府合法性的重要来源之一。福祉（well-being）是一个非常宽泛的概念，不仅涉及收入水平、贫困程度等经济方面的状况（economic well-being），也涉及躯体健康（physical well-being），还包括生活满意度、幸福感等社会心理方面的状况（subjective well-being）。中国政府一直在增进百姓福祉的道路上孜孜以求，致力于健康中国的推行。

《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的建议》对改善民生福祉的战略部署做出了的目标规划，明确提出要通过增加公共服务供给、推进健康中国建设、建立更加公平更可持续的社会保障制度等方式使民生福祉达到新水平^[2]。由于自然老化，在老年时期人们常常面临着身体的多种疾病风险，与之伴随而来的是自理能力和身体抵抗力的下降。同时，因为生产能力的降低，老年群体面临着退休所带来的社会活动与社会角色发生显著变化，由此越来越需要精神寄托与他人照料。这就使得老年人在面临着多种并存的外部风险时，自身抵御风险与恢复的能力不足，从而导致个体福祉水平降低。在面临生理机能的衰退、收入的减少、配偶的死亡、物质与精神生活满足的降低时，对于退休老人而言，退休准备是提升老年福祉的事前有效手段。

1.1.3 应对长寿风险的现实需求

随着生活水平和医疗水平的提高，个人的平均寿命有了快速的增长，长寿对人们来说是一件好事，但同时也会带来一些新的挑战。长寿风险是指人们未来的平均实际寿命高于预期寿命时，可能产生和面临的风险（段白鸽，

^[2] “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二〇三五年远景目标的建议”节选[J].环境科学与管理,2020,45(12):1.

2015）。人口平均寿命延长，老龄化程度加深，提供养老资源的政府、企业乃至个人的财务安全和可持续性发展必然会受到挑战（赵文，2014）。长寿的另一个直接影响就是现代人的退休生活大幅延长，同时当人们在面临更长时间的老年生活时，可能导致个人的财富储备不足，社会养老金产生巨大缺口，由此对老年生活带来更多不确定性。因此未雨绸缪地进行退休准备对于应对长寿风险来说就变得更为重要了。

综上，本文基于调查数据，通过构建老年福祉的评价指标体系描述老年人的福祉现状水平，并对退休准备与老年人群福祉水平的关系进行分析，不仅可以了解退休老人对退休生活规划的需求，启发社会对退休准备问题的关注，还能让政府和社会更好地精准识别脆弱老龄人口，为政府制定退休制度、社会保障制度等提供微观基础信息，促进我国积极老龄化，让更多的老年人能够共享社会发展的成果。

1.2 研究目的及意义

1.2.1 研究目的

本研究采用的是中国老年社会追踪调查数据，筛选调查对象中对问卷中回答了“对于退休这一事件，您在退休前主要做了哪些准备？”的城市样本作为研究对象。重点探析退休准备对老年人福祉的影响、退休准备对老年福祉影响的性别差异。

1.2.2 研究意义

1.2.2.1 理论意义

国内有关于退休规划与准备的研究仍然有限，多停留在有关退休规划的理论层面研究，对其影响效应的研究探讨尤其不足，在其现有的结果变量的选取上存在主观因素较多（如幸福感、满意度），容易造成矛盾与争议。其次，目前对于老年人口的福祉研究主要侧重于老年贫困、老年服务以及老龄健康和生活满意度等单一变量的量化和评估，存在人为割裂老年人福祉内部

因素之间相互联系的问题，运用老年人福祉的综合评价框架的研究较为鲜见。本研究基于积极老龄化、生命周期等理论，划分主观和客观两个维度构建老年福祉的评价指标体系，描述老年人群现有的退休准备情况与老年福祉水平，探讨退休准备对老年福祉的影响，希望可以对老年学理论研究有所贡献。

1.2.2 现实意义

经济社会的发展与人口结构的变动使得我国面临着一系列老龄化问题。老年人的福祉不仅需要个体与家庭的努力，也需要政府和社会的支持。老年处于生命的最后阶段，其生理功能和认知能力衰退以及各种慢性病发病率上升，参与社会经济工作、独立生活的能力下降，需要提高经济保障、医疗保障、生活照料、精神慰藉。研究退休准备与老年期福祉的关系问题不仅对于个人为未来退休后的老年理想生活所做的前期努力与贮备具有启发与参考价值，同时也能在政府调整退休养老制度，准备相应的医疗、养老等相关条件上具有现实意义：对老龄化问题采取针对性的社会保障措施，从容应对日益汹涌的老龄化浪潮，以提高广大老年群体的福祉水平。

1.3 研究内容与方法

1.3.1 研究内容

本文基于中国老年社会追踪调查的数据，描述我国老年人群个体退休准备的基本情况，探讨退休准备对老年人福祉的影响及其性别差异。本文主要包括以下七个部分：

第一部分为绪论。主要包括研究背景、研究目的及意义、研究内容及方法。

第二部分是相关概念及理论基础。主要是对退休准备和老年福祉的概念界定；在相关理论方面，主要引入了角色理论、脆弱性理论、积极老龄化、生命周期理论和养老三支柱理论。

第三部分为文献综述。主要梳理总结了退休准备的研究现状和有关于老年福祉的现有研究。

第四部分为研究设计。本文主要采用的是 2017 年中国老年社会追踪调查的数据，结合已有文献从主观和客观维度构建老年福祉的指标体系，将老年福祉水平作为因变量，将退休准备设定为自变量。

第五部分是研究对象的退休准备情况描述和老年福祉现状评估。该部分对研究对象的样本基本情况以及退休准备情况进行了描述统计，采用 k 均值聚类分析方法对计算出的老年福祉指数进行分类，以评估老年福祉水平，并对其做出了描述性分析。

第六部分是退休准备对老年福祉的影响分析。将退休准备作为自变量、人口学变量作为控制变量依次纳入有序多分类 logistic 回归模型，重点探求退休准备对低、中、高三种老年福祉水平的影响状况以及影响的性别差异。

第七部分在实证分析的基础上得出研究结论，并基于研究结果阐释笔者的发现与思考，据此有针对性的政策建议，最后指出本研究的不足之处。

1.3.2 研究方法

定量分析法。本文基于中国老年社会追踪调查的调查数据，构建合宜的统计模型，利用统计软件 SPSS，对本文的样本数据进行描述性分析和影响探究。描述性统计分析主要呈现样本老人的基本情况、研究对象的退休准备情况和老年福祉现状，进一步通过有序多分类 logistic 回归模型探讨退休准备对老年福祉的影响，最后分析退休准备对老年福祉影响的性别差异。

1.4 研究创新

1. 目前我国对于退休准备相关研究与实践的关注不高，同时对于老年人群福祉现状的研究还主要集中在健康与贫困、生活满意度等个别单一维度。本研究切入角度新颖，可以填补学术空白。

2. 传统的关于老年人口这一弱势群体的研究及其相关的社会保障政策多集中在一种事后观察与干预。评估老年福祉的水平是为了更有效发现可能即将陷入风险的群体，以采取措施减少其陷入风险的概率，从而减少风险控制

成本，增加政策有效性。研究退休准备议题则可以增加对于老年福祉的事前干预手段，从而让老年群体更好地应对长寿风险。

2 相关概念及理论基础

2.1 相关概念界定

2.1.1 退休准备

退休是指劳动者满足国家或企业规定的退休年龄时，随着工作内容和工作岗位的退出，享受社会保障与养老待遇的事件。根据目前我国现行的法定退休年龄相关制度规定，一般来说，各党政机关、事业单位以及各类企业职工的退休年龄分别为：60 周岁（男性），55 周岁（女性干部群体），50 周岁（女性普通职工与工人）。

退休准备（Retirement Planning 或 Retirement preparation，“也可译作退休规划”）是指劳动者在退休事件发生之前，为保障自己退休后依然维持的一定生活质量与满意程度所做出的准备与计划，退休准备的作用是帮助退休人员设立清晰而长远的目标，促进退休生活的转变与适应。它包括了财务、健康、心理、居住、人际休闲、工作等多个领域的准备（张丽瑶，王忠军，2019）。同时退休准备的各项事件拥有一定的先后顺序，主要包含了三个阶段：第一阶段表现为财务、健康准备；第二阶段是思想准备；第三阶段则是对未来生活的预期规划（华蕾，2016）。退休准备对象并不仅仅是劳动者，是多方共同参与的产物，政府和企业在其中扮演着不可或缺的角色。

综上所述，本文认为退休准备是指劳动者为满足退休后的经济需求、适应生理及心理上的变化，而从退休前就开始认知退休活动并进行一系列规划行为的过程。包括通过经济储蓄与投资、改变生活方式、筹划休闲活动、调整心态、寻找继续工作的机会等多种方式提前为退休进行准备。退休准备与养老准备有所不同，退休准备是有工作岗位的劳动者对退休以后的生活所做

的规划，包含了对退休以后老年期再生产的积极准备，而养老准备包含了不适当生产的消极意涵，不适于此研究的退休准备概念。

2.1.2 老年福祉

自古以来，我国便使用“福祉”一词来描述一种“利益、幸福、善、快乐”等事物所满足的状态，同时这个概念也代表着人们对开放社会、自由环境、美好生活、和谐共处、稳定祥和、有序社会的美好追求和希冀。在学术上，并没有公认的对“福祉”的定义，但诸如福利、幸福、生活质量、生活满意度、经济能力、人类发展等概念均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和福祉这一概念进行互换使用（王伟，2020），因此探讨福祉的概念主要在于人们是否具有健康、快乐和富足的良好状态（陈明星等，2020），并按照主观福祉和客观福祉进行了概念上的解释与界定。由于研究对象与视角的不同，不同学科领域的福祉内涵存在着一定的差异。在自然科学领域中，在解释环境与人类福祉关系的时候使用了资本的概念对福祉水平进行补充和阐释，认为自然资本（Natural capital）、社会资本（Social capital）、人工资本（Built capital）、人力资本（Human capital）和时间共同构成了人们满足自身需求的客观条件，从而确保其生活质量和幸福感水平（Costanza et al., 2007）。而在社会科学研究中，对福祉的概念主要在于探讨民生福祉与居民福祉，并通过主观福祉与客观福祉的差别进行定性与定量研究。经济学与社会学研究尤其将居民福祉水平作为关键概念，作为衡量国家综合发展水平和国际竞争力的重要指标（王大尚等，2014）。

老年群体的特殊性使得他们所需的福祉水平应同其他群体区分开来，老年福祉的研究随之受到研究者们的关注。老年福祉这一概念并未有一个统一的概念定义，但学者们在对其给予自己的定义时存在共识，即：老年福祉首先应以老年人群的主观需求出发，其范围包括老年人经济福祉、健康福祉、情感福祉等所带来的老年人幸福生活状态（骆为祥，2016）。同时，老年福祉与老年健康、老年幸福感、老年生活满意度等概念存在联系但又有一定差别（秦永超，2019）。他们的联系在于，人们处于老年阶段时，本身是一种社会脆弱性状态。在面对老年生活期间所可能发生的各种意外与风险时，又

因为自身的应对能力不足而表现出生理、心理状态受到损害或遭受负面影响。他们的区别在于老年群体的福祉水平不仅仅是老年群体自身的健康水平、主观幸福感、生活满意度等生活质量的反映与表现，还是一项社会、国家、家庭共同参与的一项民生工程与特殊项目。老年福祉水平的高低是家庭和谐生活、发展、互惠的晴雨表，是老年人所在社区整体福利水平和社会关怀水平的水位线，关系到全社会的民生福祉。

在对老年期的界定范围上，国际与国内存在差别。国际普遍划分 65 周岁以上的人为老年人，我国目前法律规定老年人的年龄起点标准是 60 周岁，并规定这一年龄为男性退休年龄。同时为服务于定量研究中参考的中国老年社会追踪调查问卷的样本为 60 周岁及以上的客观现实，本研究将老年期视为 60 周岁及以上的时间阶段。

因此，本文对老年福祉定义：老年福祉是指人们在老年阶段（60 周岁及以上）中，在生活方式、物质条件与精神状况是否表现出的良好状态。老年福祉是家庭和谐关系的关键指标，是社区服务安排的重要项目，是社会福利制度表现的首要目标。同时，老年福祉以人为核心包含生活满意度等主观维度，反映良好的福利水平和人文关怀程度；老年福祉亦包含身体状况等客观维度，反映优质的健康状况和生活质量。

2. 2 理论基础

2. 2. 1 角色理论

社会角色代表着一种或多种社会属性。人的一生中，经历着不同的年龄阶段或生命阶段，伴随着不同社会角色的转变，多个角色代表的社会属性会出现角色冲突的现象（喻安伦，1998）。退休这项事件带来的角色转变与角色冲突是在职业场域到退休后场域（家庭等）的过程中完成的，角色转变的完成度与角色冲突的程度取决于退休者对前一社会角色的认同与关联程度，更取决于退休角色的事前准备与规划，从而形成个体对新角色的适应能力及其退休态度（Christine, 2003）。其次，退休后的角色与退休前的角色之间的关系是一个前者削弱后者增强的关系，两个社会角色之间的成功扮演需要退

休者对两者社会行为规范、知识、技能进行合理的调整，需要家庭、社区、乃至整个社会对退休者给予帮助（Mein et al., 1998）。

由此可以发现，角色理论可以对退休者和研究者提供如下思路：第一，退休者所扮演的新角色在适应的过程中，应当了解角色变化的情况，学习与自己年龄与生命阶段所相宜的社会规范，从而融入社会。而在这种适应过程开始阶段，就应当为之后的角色转变做好相应准备。第二，退休这项事件在党政机关、事业单位以及各种其他性质的企业中存在差异性，不同群体、不同地区、不同职业的退休者在退休事件之前所扮演的社会角色因此也具有差异性。因此研究者在调查、研究退休准备这一议题时，应当注意退休者参与退休准备的个体差异的影响因素，从中衡量学习新角色的具体原因与实际作用机制。第三，适应新的社会角色可以从多个其他社会角色中学习和维持，换而言之，适应退休后的角色可以从新的工作规划、相关兴趣爱好等其他社会活动中扮演其他角色中完成（朱盼玲，麦颖特，2019）。通过这样的方法，有利于退休者减缓退休事件带来的不适、减轻角色冲突带来的负面影响、提升生活满意程度，进而增进老年人的福祉。

2. 2. 2 脆弱性理论

脆弱性理论最早是属于自然灾害研究领域的理论，以敏感性与适应能力的差别来分析人地关系和生态可持续发展。现在脆弱性理论的应用范围已经由自然系统拓展到了社会系统，研究内容与方法也更加多元（童磊等，2020）。社会科学利用脆弱性的理论框架，主要研究贫困、健康和社会脆弱性三个层面。社会学将其作为分析工具是因为脆弱性更能完整描述事物生存状态的复杂性。脆弱性主要是指个体或组织面对风险冲击时的一种不稳定属性或状态，这种状态是由其自身的风险敏感性和应对能力相互制衡，共同作用的结果（于长永，何剑，2011）。脆弱性理论主要包括三层内涵：第一，脆弱性的首要内涵是一种不稳定的状态，这种不稳定的状态存在于事物内部，并且作用于事物本身的整个系统内部；第二，事物的整个系统内部具有一定的敏感程度，来源于外部环境的变化以及外部压力的干扰；第三，在面临外部环境的变化以及外部压力的干扰时，该事物的系统容易受到负面影响或损害，并且较难

复原（史培军等，2006）。脆弱性是一个前瞻的、动态的概念，强调的是对事前状况的探究，以脆弱性视角对事物进行研究，可以通过提高抵御风险的能力，弥补事后干预的不足（付璐，2017）。

退休后的人群一般身处在人的老年阶段，老年人口作为相对弱势人群，面临着健康、经济、社会支持、文化心理等多重风险，加上自身抵御风险能力与复原能力较差，具有脆弱性；其次，退休者的敏感性，来源于外部压力的干扰：子女很难给予相应的陪伴关怀以及其他负担、自身面临一系列社会环境的变化使得退休人员容易受到负面影响或损坏；最后，退休者脱离工作带来的经济收入落差、工作精神状态结束的孤独与失落、深感自己无用的内心感受使得其成为社会关注的脆弱性对象。通过对退休准备的研究，提前规划退休者的老年生活与养老方式，有助于退休者群体对老年期可能面临的风险进行预估和采取措施，以提高其应对风险的能力，进而提升老人群体的福祉水平。

2.2.3 积极老龄化

“积极老龄化”这一“健康、参与与保障”的概念由世界卫生组织在1999年提出，其主要目的在于关注老年群体的身心健康、促进老年群体生活质量与生活满意度的提高、使老年群体继续在社会中发挥更大作用、实现更佳的社会整体效益（WHO，2003）。这一概念既适用于各社会成员个体又适用于整个社会群体，要求人们改变老年人歧视观，以乐观正向的心态对待人口老龄化现象带来的问题，以更为积极的态度对待老年群体。“积极老龄化”的含义由“健康老龄化”发展而来，它不仅包含了保持老年人健康状态的内涵，还将老年人视为社会发展与实现总体效益的重要资源，强调与鼓励老年人对社会发展的促进作用。积极老龄化主要内容是：第一，作为基础的“健康”，代表着老年人应保持一种生理上的、心理上的、社会适应能力上的总体良好状态。在这种良好状态下的健康老年人在参与社会互动中，才能更好利用社会资源，实现老年人的福祉满足，整个社会更好地良性运作。第二，参与是积极老龄化的关键。它强调老年人的社会参与对社会具有贡献。社会各界要支持老年人根据自身意愿和身体状况参与到社会活动和工作中来，发挥其自

身作用，在老年人实现自己的人生价值的同时也能为社会作出生产性贡献。第三，保障是前两者的必要条件。它要求国家通过完善相应政策与环境为老年人提供保障，同时鼓励人们在年轻时期为老年期生活做好前期准备。老年人的需求是多元的，所以要动员家庭、社区和政府的多方力量为老年人提供社会服务（曹娟，2013）。我国一直对于积极老龄化有相当强的重视力度，2019年11月，由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的《国家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中长期规划》对积极老龄化做出了重要批示，确定了一系列相关战略措施。规划中强调社会各界应积极关注退休老年人的社会适应问题，同时应健全相关社会保障制度，增加养老财富储备，警惕老龄化过程中老年群体的脆弱性风险，从而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现象。

强调退休准备能使个体对老年期生活进行提前规划，从而增强个体对未来的退休生活的积极态度和适应性；通过促进家庭、个人建立养老财富储备，进而增加全社会的养老财富储备；以个体层次健全完善整个社会的保障体系，可以提升老年人口乃至整个社会的幸福感与安全感。基于积极老龄化概念可以做出判断，合理的退休准备能积极促进整个社会的经济发展、健全社会发展体系，使其发展脉络与人口老龄化进程相匹配，同时使老年群体在退休后能够适应新的社会角色，在生理上、心理上、社会适应能力上实现更好的健康状态，在实现自己的人生价值中为社会做出更大的贡献。本文欲使用积极老龄化的概念来揭示退休准备给予老年群体的积极作用。

2.2.4 生命周期理论

生命周期理论被广泛应用于不同研究的领域。在心理学领域中，包含了人或家庭两种生命周期，是指其从出生到衰老和死亡的发展过程。经济学学者基于生命周期理论解释了人口年龄结构变化对消费行为的影响，根据微观经济学的消费者行为理论认为，理性人会根据收入来合理规划自己的消费与储蓄。人的一生分为年轻、中年和老年三个时期。在年轻时期，由于处于接受教育和资本积累的阶段，一般人们的支出将大于收入；中年时期进入劳动市场，有了稳定收入，消费占比降低，支出变为小于收入；在老年期，由于偿还年轻时期的负债和为了养老而储蓄，同时退休导致收入下降，支出又会

大于收入（郑妍妍，2013）。因此劳动者在退休前进行储蓄、投资等计划行为是符合生命周期假说模型的。

因此基于生命周期理论，本文认为，随着老龄人口不断增加，养老问题不断凸显，对于一个理性人来说，在面临退休事件时，他将会提前对自己未来的老年生活理性评估。在进入老年期之前，通过投资或储蓄等方式储备资金，进行财务上的退休准备，从而为老年生活的物质保障奠定基础。

2.2.5 养老保障三支柱模型

养老保障三支柱模型是1994年世界银行在对养老金制度改革建议中提出的，其核心内容是指养老金支柱的提供者应该向多元模式发展，以应对单一制度中的老龄化问题。社会的养老金保障需要具有储蓄、再分配以及保险三方面的作用。为此，养老金制度应具有三个支柱体系：第一支柱是基础，是以政府为主导、法律规定的公共养老金计划，并且政府为其提供最终责任和保障，为退休人员的老年生活奠定基础保障。公共养老金计划是人们在工作阶段通过纳税方式支付。第二支柱是职业养老金计划，它是由企业与个人共同缴付的。如今在部分国家中，职业养老金计划已经成为了主体。职业养老金计划是通过企业匹配和个人缴费，加上累计投资收益作为给付基础而实现的，此种模式能够有效应对老龄化的加剧，减轻政府公共养老金的负担。第三支柱指的是公众个人的养老储蓄计划，它是完全基于个人意愿的储蓄活动，一般来说，国家应对给予个体税收优惠，以体现个体和家庭的养老责任，以此为个体自身的老年生活提供更加充足、安全的养老保障^[3]。

当前中国的养老保障制度体系仍是第一支柱，即政府提供的公共养老金计划为主，第二和第三支柱发展不足，作为补充，养老三支柱体系仍需完善。社会福利的来源不能单纯依靠国家、市场或个体某一方，三者应当互相补充，从而形成一个完整高效的社会保障体系。本研究试图通过以个体微观视角研究退休准备与老年福祉的关系，以期为我国社会保障制度的第三支柱发展奠定理论基础，同时对公共与企业的政策措施提供政策建议。

^[3] 2017年我国养老保险行业养老金体系的三支柱模式分析·中国报告网·2017-10-31

3 文献综述

3. 1 退休准备的相关研究

3. 1. 1 退休准备的研究现状

个体退休准备研究是基于退休人员的老年生活质量需要、人口老龄化等问题对社会保障制度的冲击、退休人员增多对政府提供公共资源给予的压力等一系列背景（刘泓利等，2016；华蕾，2016）。由于各国进入老龄化社会的开始时间和各自面临的老龄化问题以及国家的实际情况有所差异，国内外研究退休准备问题的范畴和重点都有所不同。国外对退休准备相关问题关注由心理学研究中的对退休心理压力与生命周期的研究关注（Walker, 1966）伊始，进而发展到更加广泛和细分的研究领域之中：由早期主要关注储蓄、养老金等财务准备拓展到了健康、社交休闲、工作、心理、居住、退休准备教育等各方面（张丽瑶，王忠军，2019）。有学者将退休准备划分为活动规划、经济规划、退休居住规划和关系规划四种模式（Adams, Rau, 2011），将早期的工作规划内容转化为关系规划。在退休准备的主体上，也分别从社会、企业、个人不同层面阐述了各主体责任（Michael, 2012）。尤其是在个体退休准备方面，由于面对当代老龄化社会的多重挑战，退休者并未表现出比以往退休者更加完善的退休规划与计划（Robert, 2004），所以有研究强调在企业和社会层面为个人提供退休准备教育，以帮助退休者培养兴趣，重视退休准备这一活动（Van Solinge et al., 2008）。

我国学者对于退休准备的研究起步较晚，但民众普遍的储蓄习惯使得退休准备的研究在开始便有了良好的土壤。较早的研究退休准备这一议题的是由清华大学中国保险与风险管理研究中心与同方全球人寿保险共同发起的中

国居民退休准备指数调查，该研究的退休准备主要是指财务准备。根据其最新报告显示，中国居民的退休准备指数在近两年持续保持增长的态势，具体排名为十五个调查国家的第二位，主要是因为受访者对未来的预期较为积极，但个人对退休规划的认识和行动还是不够充分。究其原因可能是我国目前存在的国家与社会整体与个人三者之前很难找到财务准备的均衡点，无论是从公共意愿还是政府的决策目标导向来说，退休准备都是多方共同参与的产物（华蕾，2016）。另外，我国较为关注有关于退休准备教育的探讨，纳入企业这一退休事件发生的核心场所，强调从政府、企业和成人教育不同主体构架退休教育制度体系，有助于临退休人员科学规划未来生活，实现对退休生活的良好适应（张德馨，2012；王晨晓，2014；陈曦慧，2016；郭越昭，2019）。

退休准备的类型和范围在前文已有阐述，但在实证研究领域中常常使用问卷法对退休准备进行测量，很难考虑到人们的不同准备方式，缺乏合适的退休准备测量的理论，并没有形成一个较为完善、适用范围较广的量表或评价指标体系，已有研究对退休准备个国家地区出现过的问卷或量表进行分类与汇总（张丽瑶，王忠军，2019）。

3.1.2 退休准备的影响因素

退休准备的影响因素以及其作用机制是退休准备研究另一个重要的议题。影响个体退休准备的因素非常广泛，梳理国外相关研究发现，退休准备的主要影响因素有人口学变量（年龄、性别、受教育水平等）、环境变量（宏观社会文化环境、地区国籍等）和心理变量（性格、情感倾向、期望等）三个层面（Noone et al., 2009；刘泓利，方远华，2016；张丽瑶，王忠军，2019）。值得注意的是，个别退休准备的影响因素在学术界有某些争议，以性别在退休准备的影响情况为例，传统的西方研究者认为，男性相较于女性群体在退休规划的充足性与目标确定性上均强于女性（Ostuw et al., 1999），但是随后在一项针对男女群体的经济准备研究中发现，在这项退休准备上男女性并没有出现明显差异（Hershey et al., 2007），面对不同调查群体与不同时间阶段所形成的差异需要学者对这项议题进行更多调查。通过探讨退休准备的影响因素能够映射一些社会议题，比如有研究讨论了中年女性专业人士不愿做退

休准备的原因，旨在为妇女休闲的不公平提供制度建议（王曦影，吕道昱，2018）。近年来，随着退休政策的调整，国内的研究者们更加重视职工延迟退休意愿对退休准备的影响（李东方，江建，2017；曹仇晨，2017；袁红兰，2018；蒋钰涵，2020）。而通过分析退休准备的影响效应与机制，强调其对于退休生活的积极作用，可以引起社会对退休职工更多的重视。

3.1.3 退休准备对晚年生活的影响

现有研究主要聚焦于退休准备对退休后的生活适应性的积极影响。具体表现在通过对个体健康水平和生活满意度产生作用，从而带来良好的退休自信心，以适应退休后的生。首先，个体在经济和心理上对退休做出准备，对退休后的自评健康水平（Noone, 2013）和健康改善（Gubler, Pierce, 2014）呈现着显著的正相关关系，尤其表现在心理健康水平的方面。不少研究证实，退休准备对减少退休者的焦虑和抑郁，增强退休自信心，维持良好的心理状态具有积极意义（Fretz et al., 1989; Reitzes, Mutran, 2004; Wang, 2007; Gabriela et al., 2009）。由此大量研究进一步指出，充足的退休准备对提高个人幸福感能产生重要意义，这也是退休准备最主要的影响（Dorfman, 1989; Donaldson et al., 2010; Muratore, Earl, 2011）。同时，研究发现在退休之前对退休之后的休闲活动进行计划与选择的退休人员大多数具有明确的退休目标（Topa et al., 2009），而且明确的退休准备目标还是提升生活满意度的决定性因素（Hershey et al., 2002; Irving, 2012）。退休后的选择还包括对自己在退休前后权力与权威程度的转化的预测，对自己的社会关系提前进行退休规划有助于生活满意度的提升，例如退休者提前规划自己的婚姻关系会显著提升自己退休后的婚姻质量（郭爱妹，2016）。退休准备对以上因素的积极影响都能使个体更好地适应退休后的生（Schellenberg et al., 2005）。

有研究表明，退休准备对退休时间和退休决策也会产生影响，其作用机制主要作用于退休转折与心态调适的退休决策之中（Adams et al., 2011）。退休决策的过程包含着三个阶段：预测退休可能性、评估退休时间、将计划付诸行动（Feldman, Beehr, 2011），有较好退休准备的人可能会更早地退出工

作岗位（Taylor, Shore, 1995）。同时，退休准备有助于促进老年就业，发现退休前的计划往往与退休后的工作活动存在一定关系（Maestas, 2010）。

但是也有研究发现退休准备并非只具有正向作用。如果退休者没有长期爱好，仅仅是在退休前临时或被动地培养兴趣爱好，这样对兴趣爱好进行退休准备可能会带来意料不到的心理困扰与问题（Yeung, Dannii, 2013）。此外，退休准备与退休者继续就业问题的关系也还存在争议，由于受到退休前工作满意度的影响，退休准备少的员工相较于规划较多的退休者而言，更可能参与过渡型就业（Wang et al., 2008）。由于退休准备对参与过渡型就业的影响研究还较少，他们之间的影响因素也较为复杂，还需后续更多相关研究进行讨论。

3. 2 老年福祉的相关研究

在学术上，最早的提出和应用福祉概念的是地缘政治学，以民生福祉作为重要指标，来衡量国家综合发展水平和国际竞争力，但是由此发展出的老年福祉在近些年已经成为了人文科学的研究热点话题。本文提到的老年福祉属于居民福祉的范围。

3. 2. 1 居民福祉的研究现状

改善人民生活品质、提升人民福祉水平是我国在“十四五”规划期间的着力点。随着我国经济发展水平的不断提高以及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与追求，政府开始向教育（公共与私人）、社会保障和就业、卫生健康等公共服务领域稳步增加支出。最新的数据表明，2020 年一年，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支出约 245588 亿元，较 2019 年增长 2.8%，其中交通运输、文体传媒、教育、社会保障和就业、卫生健康分别增长 3.2%、3.6%、4.4%、10.9% 与 15.2%。在 2020 年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同比下降 3.9% 的背景下，国家依然对相关公共服务的支出依旧保持增幅，这个“剪影”映照出政府对提升人民福祉水平的重视。但最开始的情况并非如此，学术界对于福祉的研究伴随着一个从“唯 GDP”观念到民生幸福与关怀的转变。20 世纪 50 年代，二战之后的全

全球经济面临复苏态势，研究者秉持国民收入增长对社会经济福利的领头羊作用，更多关注GDP、收入、消费等经济指标上的福祉研究。从而全球各国普遍使用国内生产总值，即GDP来衡量一个国家的经济发达程度，各国政府的政策落脚点放在了追求经济发展（Costanza et al., 2014; 许宪春等, 2018）。然而，经济增长水平并不能完全代表居民真实的居民福祉水平，研究表明发达国家的居民经济收入的增长并没有相应提升他们的总体福祉，这就是著名的伊斯特林悖论（Easterlin, 1995），同时我国学者亦用我国的研究数据发现发展中国家也存在类似的现象（李路路，石磊，2017；巫强，周波，2017）。随后的研究使得学者们开始意识到，社会发展与居民生活质量的提升关键可能不仅仅在于提升GDP或是单一地追求经济增长，社会公平与公正、人们对环境问题的反思、经济增长带来的负向作用与代价，统统揭示着政府施政的终极目标应当放在确定居民的民生福祉水平以及如何实现其福祉的获得之上（Diener, Suh, 1997; Stiglitz et al., 2013）。学术界开始思考如何补充GDP等指标之后的其他福祉水平确定，进而引导新的社会发展方向。

基于上述对福祉的认识，越来越多学者投入到人类福祉或是居民福祉的研究中，但第一步是对福祉进行概念上的定义。福祉的这一概念，在学术上并没有公认的定义，但诸如福利、幸福、生活质量、生活满意度、经济能力、人类发展等概念均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和福祉这一概念进行互换使用（王伟，2020）。比如Diener等学者把生活质量指标分为经济指标、客观社会指标（包括公共卫生状况、犯罪率等）和主观社会指标（即生活满意度、幸福感等）三类，并将这三种指标的评判标准进行界定：是否能充分满足需求、是否符合社会的规范和是否为个人的主观体验（Diener, Suh, 1997），一定程度上给予了福祉这个概念有客观和主观的分类模式。福祉的概念在学术上大致可以按主观福祉和客观福祉进行概念上的解释与界定。主观福祉在概念上多以效用、幸福感、人的需要得到满足来作为评价的标准，这一观点源自马斯洛的需求层次理论。对主观福祉的界定有一定的分歧与区别，例如将主观福祉分为主观幸福感（Subjective well-being, SWB）和心理幸福感（Psychological well-being, PWB）。主观幸福感的哲学本源来自阿里斯提波的享乐福祉（Hedonic well-being）和边沁的功利主义（Utilitarianism），认为福祉的评判标准是人是否拥有快乐的体验；心理幸福感则是源自亚里士多德时期的实现

论（Eudemonia），将福祉的重点放在人的潜力发展与自我潜力的实现，以及寻找人生的意义（Ryan, Deci, 2001）。由此主观福祉的概念框架多包含：个人基于自身标准对自我状况的幸福感的主观评价（Diener, 1984）、人对生活的总体评价、社会参与感（Gabriela, 2009）、个体生活满意度（David G et al., 2004）等定义。而客观福祉的概念重点放在客观资本（譬如物质条件、生态环境、经济等）的满足上（赵士洞，张永民，2006），从而构建满足这些条件的评价体系，例如人们熟悉的人类发展指数（HDI）。随着时代的发展和人们对美好生活的不断追求，福祉的主观与客观分类渐渐融合为一个整体的态势，但这也使得研究居民福祉的整体评价体系变得越来越复杂。

人类福祉水平与居民福祉水平的测度通常采用建立指标体系的方法，在不同的概念框架下，学者们进一步提出了一系列测量国民及个人福祉水平的主观与客观指标，包括了如何选取指标与权重确定，以及将政策相关建议进行进一步结合等（Diener et al., 1997; Kerk, Manuel, 2008; Forgeard et al., 2011）。客观指标体系的概念框架包含着对基础需求的确立与基本需要的满足，囊括了各类物质的（如住房条件、收入情况、财富状况等）和非物质的（如教育、医疗、安全等）客观条件指标（Sumner, 1996）。通常客观评价指标体系主要用于评价一个国家或是一个地区的社会福祉水平，国内有学者就通过构建指标体系对当地居民的福祉进行评估（杨莉等，2010；潘影等，2012）。目前，世界上最有名的客观指标体系包括了由 Mahbub、Amartya 发明推广的包含健康、知识、生活质量三个维度的人类发展指数（Human Development Index, HDI）、John、Clifford 等发明推广的包含社会、经济、环境三个维度的真实发展指数（Genuine Progress Indicator, GPI）和包含教育程度、生活水平、环境方面、居民总体健康、时间运用、社区活力、休闲和文化、民主参与等多个维度的加拿大幸福指数（Canadian Index of Well-Being, CIW）等（黄甘霖等，2016；陈明星等，2020）。

主观福祉的评价体系在于关注个体对环境的感知和认识，由此带来自己的一种心理感受。主要度量的是个体的情感反应与认知情况。福祉的主观指标的一个常见评估领域在于主观幸福感（Subjective happiness）。主观幸福感在操作化后的结果是一系列人们对自己的日常生活情况以及生活质量的整体上的评价，由认知组成（Cognitive component，比如生活满意度）和情感组成

(Affective component, 包括积极性的情绪和消极性的情绪) 两部分构成(Diener, 1984)。最通用的幸福感测量方法：自陈量表较为便捷，主要方法为人们将自身的心理状况由记录者通过问卷或访问记录下来，包含即时和长期的心理体验。此外，单条目和多条目两种形式的幸福感量表(Diener, 1999)也被后来的学者所采用。国际上常用的生活满意度和情感测度的单条目量表和多条目量表主要有，自我标定量表(Self-Anchoring Scale, SAS)（单条形式）、生活满意度量表(Satisfaction With Life Scale, SWLS)（多条形式）、Gurin量表(单条形式)和D-T量表(单条形式)等(Cantril, 1965; Diener et al., 1985; Gurin et al., 1960; Andrews et al., 1976; Russell, James, 1980; Watson et al., 1988)。之后的信息技术发展又诞生了经验取样法(Experience Sampling Method, ESM)和溯源法(Day Reconstruction Method, DRM)等方法，单条目量表和多条目量表不便于记录日常生活瞬时情感的缺点也有了有效的解决方式(Kahneman et al., 2004)。主观福祉评价体系研究在心理学上也有更多评估内容，包括参与感、乐观、自尊、负面情绪等(Haq, 2009; Smith, 2010)。

早期的居民福祉研究主要为经济学、社会学和心理学方面的经济因素(Maarten et al., 2007)、社会文化因素(Diener, 1997)、个人心理因素(Forgaard et al., 2011)研究。近年来居民福祉研究也拓展到了生态学、地理学等其他领域，有关可持续框架下的人类福祉评价(黄甘霖等, 2016)、生态系统服务与人类福祉(李琰等, 2013)、福祉水平的空间不均衡(Schwanen, Atkinson, 2015; Pacione, 2003; Kerk, Manuel, 2008; Costanza et al., 2007; 王圣云, 2017)、时空行为与居民福祉(Dorling, 2011; Schwanen, Atkinson, 2014)等方面的研究也取得了较为丰硕的成果。

3. 2. 2 居民福祉的影响因素

探讨居民福祉的影响因素时，因客观福祉的定量评估要求，选取的指标基本来自全社会尺度上便于统计的社会经济指标，难以确定其影响因素，或者说其本身也是客观福祉的影响因素之一，所以学者们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主观福祉的影响因素和机制上(Dolan et al., 2008)。但主观福祉的影响因素可能伴随着客观福祉的表现，因此客观评估和主观评估尽管在方法存在差异，

结果却可能存在着一定的相关性 (Oswald, Wu, 2010)。比如研究者常常将个人的社会经济地位或是收入水平作为客观福祉水平的主要预测因素来测度客观福祉 (Maarten et al., 2007)，同时也有研究表明在虽然在发达国家中，家庭生活对于幸福感或主观福祉的影响更大，但在欠发达国家之中，个人经济实力与获取财富的能力对其的影响更大(Oishi et al., 1999; Diener et al., 2003)，因此在探讨居民福祉的影响因素时，不能将主观福祉和客观福祉隔离开进行讨论。居民福祉研究中，影响居民福祉的因素主要分为四大类：个人因素、经济因素、社会参与因素、其他社会因素 (Diener et al., 2009; Dolan et al., 2008)。个人因素又分为以下两个类别：首先是个人心理特征，比如个人性格特质 (Deneve, Cooper, 1998)、过高或者过低从而与现实出现反差的个人追求 (Knight, Gunatilaka, 2012)、良好习惯 (Gao, Smyth, 2011) 等；其次是人口特征因素，比如性别、年龄 (Ryan, Deci, 2001)、婚姻状况 (David, Blanchflower, 2004; Clark et al., 2019)、民族、种族、职业、受教育程度等等。此外健康作为一个个人心理特征与人口特征皆体现的因素也会对福祉水平产生较大的影响 (David, Blanchflower, 2004)。影响居民福祉的另一个重要因素是经济因素，在这之中又存在宏观的国家或地区经济水平和个人的社会经济地位。国家或地区经济水平对居民福祉的影响在学术界的讨论中存在一定分歧，传统的经济学观点认为国家或地区的经济发展极大程度上决定了居民福祉的水平，但更多的关于幸福感的研究证明在富裕国家和贫穷国家生活的不同群体的幸福感差距不大 (Oishi et al., 1999; Diener et al., 2003)，并且提升 GDP 等传统经济指标对于提升整个国民的幸福感的作用并不突出 (Easterlin, 1995)。值得注意的是，学术界广泛认为个人的社会经济地位是预测居民福祉水平的重要影响因素。社会参与因素是社会学研究议题的一个重要参考指标，无论是家庭与人际关系方面的家庭社会化过程还是整个社会对个人社会化过程都作用于居民福祉的提升 (Liu et al., 2017; 刘义等, 2018)，家人、朋友、社会组织给予的社会支持与社会资本的累积均有利于居民福祉的增进 (Aminzadeh et al., 2013; Pinquart et al., 2000)。最后是其他社会因素，包括社会公共服务水平、交通、社会保障等积极因素 (Dolan et al., 2008; 单梦静, 2019) 与弱势群体 (留守儿童、外来务工人员、老年人、残疾人) 的社会歧视、社会排斥等消极因素 (Knight et al., 2010; 徐从德, 2020)。居民福祉与

人类福祉的影响因素具有一定的差异与特殊性，需要更多的相关定量研究进行补充，并结合我国诸如城乡一体化等实际政策的整体协同作用展开讨论与建议（田建国等，2019；王伟，2020）。

在探讨居民福祉的影响因素研究中，各类学科的研究对象的差异导致其影响因素的选取亦存在区别（赵士洞，张永民，2006）。如何突破多学科交叉局限，将主观福祉指标与客观福祉指标有机结合，多维选取相关因素进行检验从而找到提升居民福祉的途径是我国福祉研究发展面临的一项挑战。

3.2.3 老年福祉的研究

老年福祉是一个多维的概念。从广义上来说，老年福祉包括老年人在其老年期的健康生活方式、幸福生活状态的物质条件与精神上的富足状况（秦永超，2015；骆为祥，2016；黄甘霖等，2016）。狭义上，根据居民福祉的分类方式，可以划分为老年人的主观福祉与老年人的客观福祉。已有的研究主要集中在讨论老年人的主观福祉（Subjective Well-Being），其研究内容包括老年人的幸福感（吴捷，2008）、老年群体的自评健康状况（来文敬等，2012）、老年人群晚年生活的满意度（骆为祥等，2011）、老年群体的乐观程度等正向情感（刘颂，2002）与抑郁倾向等负向情感（陈肇男，林惠玲，2015）等等。基于影响机理的复杂性以及难以收集全面的评级指标的客观条件，将老年人的主观福祉整体纳入一个评价体系进行评估是一个较大的挑战。值得注意的是从主观福祉的多个维度出发，将单个维度的指标与其他维度的指标进行交叉检验后来测量主观福祉的有效尝试，被学者用于检验其他变量对老年群体的主观福祉的实证分析之中（王金水，许琪，2020）。而因其客观指标的可获得性与数据的代表性，研究老年群体的客观福祉，多是纳入一个整体的评价体系进行评估，从而考察老年群体的经济水平、慢性病个数等健康水平、预期寿命等老年人实现更佳生活所需要的客观条件与措施（杜鹏，李强，2006；赵晓航，2014）。

在探寻影响老年福祉的多种因素时，学者们基于不同人口学特征（性别、年龄、婚姻状态、受教育水平、收入、多种健康状况等）的老年群体（叶敬忠等，2014；姜向群，刘妮娜，2014；秦永超，2019），不同社会条件（家

庭照料、情感支持、休闲娱乐状况、地区文化等)的老年群体(张文娟,李树苗,2004;桂世勋,2008;左冬梅等,2011)等具体差异,根据实际状况进行了多方位的实证分析。人口学特征中个别影响因素直接影响老年福祉的获得,比如女性与男性老年群体在抑郁程度、幸福感、生活满意度上的表现存在明显差异(丁玲等,2014);高学历的老年人较低学历的老年人在生活满意度评价表现明显较好(陈天勇等,2003);经济收入情况直接性降低老年人的抑郁倾向,从而影响老年福祉的差异(沈可,2013)。但也有诸如年龄(解登峰等,2011)、健康状况(Raymo et al., 2008)等人口学特征通过影响其他因素作用于老年人的主观福祉(满意度、幸福感等)。同时,各方面的人口学特征又与社会条件之间存在交叉影响,有学者根据拉贾斯坦邦与印度的部分地区的调查数据发现,男性老年人与女性老年人的主观幸福感因社会支持或其他负面的生活事件的差异体现了显著的不同影响(Manpreet, Roopa, 2018)。此外在一项来自英国和印度老年学研究发现,剔除性别差异带来的中介效应后,在文化的作用下,老年群体在幸福感、生活满意度等多个主观福祉上存在明显差异(Sargun, Gill, 2014)。

老年群体的复杂性以及老龄化的消极后果,会直接影响到老年人与家庭和社会的关系,进一步影响老年福祉,不同的地区文化背景下的老年人对福祉有着不同追求,使得反映他们幸福生活的影响因素存在广泛的观点分歧。

3.3 文献评述

综合以上文献,可以看出国外关于退休准备的研究内容与领域都已经比较广泛。而目前我国的相关研究尚处于起步阶段。理论方面,我国的研究大多是在国外研究的基础上进行理论梳理;而实证研究则多集中在财务准备层面。在探讨退休准备对老年生活的影响时,国内外学者都比较重视老年心理健康与生活适应性问题,尤其是国内研究定量分析较少,存在研究空白。从我国老龄化的现实和社会保障体系建设的需求出发,拓展退休准备的研究十分必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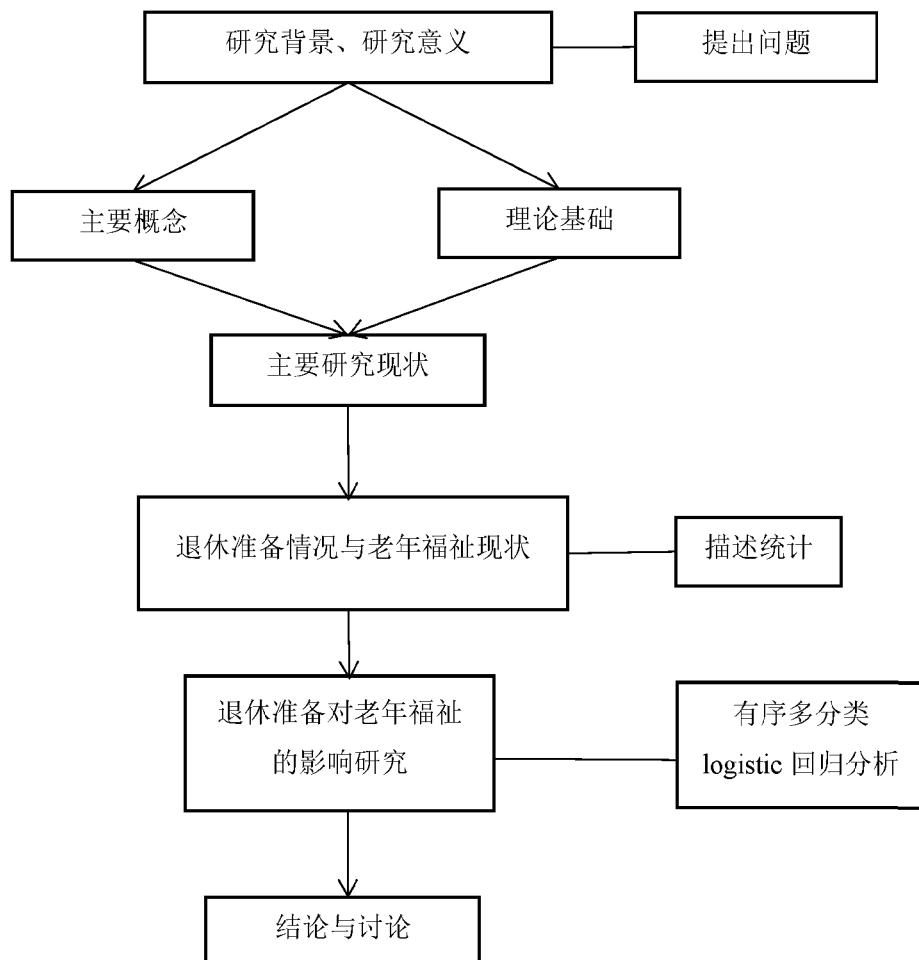
国内外学者在老年福祉的概念界定与测量尚未达成共识。目前的研究主要集中于居民福祉的维度、评价体系或是量表的研究,也涉及到了健康、养

老服务等层面；对老年福祉在不同维度上的表现、影响机制和对策展开了一定研究，但仍缺乏多维度探讨老年福祉的影响因素的实证研究，缺少对研究这一脆弱群体的整体视角和多元因素的探讨。其次，对于老年群体的福祉水平，较少有研究采用退休准备作为切入点探讨对老年福祉的影响，而本文所指的老年福祉则是一个包含了经济、健康、社会等多维度的概念。已有研究中退休准备的影响内容（幸福感、健康等）与老年福祉情况有高度相关和重合的部分，因此，研究退休准备与老年福祉，探索不同的退休准备对老年群体福祉水平的影响，对其进行事前观察与干预，能够有效提升老年群体的福祉。政府、社会、家庭乃至个人，才能采取有针对性的政策和措施。

4 研究设计

4. 1 研究框架

本研究基于如下流程展开：



4. 2 研究假设

过往研究表明，退休准备对老年生活的健康水平、生活满意度以及适应能力都具有积极作用（刘泓利等，2016）。有国外的研究发现，没有退休规划的人，会因为储备资金不足、生理机能的不断衰退，而过上长期贫穷、幸福感低的老年生活（Lee, 2003; Gurd, 2012; Leandro-Franca et al., 2016）。个体在老年时期要想维持退休前的生活质量，财务准备是至关重要的因素（张丽瑶，王忠军，2019）。目前退休准备的研究还主要集中在财务准备领域，有研究发现，财务准备与老年生活的幸福感、满意度直接相关（Dorfman, 1989），没有经济的保障，其它的准备都是难以维持的（Mock, Cornelius, 2007）。可以说，财务准备直接影响到老年人的经济脆弱性水平。在社会、家庭和个体层面，经济状况都是老年人群生活水平呈现差异的重要因素（解垩，2014；于长永，何剑，2016；曾通刚等，2019）。另外不少研究证实，调整退休后的生活方式对减少退休者的焦虑和抑郁，增强退休自信心，维持良好的心理状态具有积极意义。对于原有的生活方式进行退休计划也会提高老年人的对退休生活的调试能力（Dorfman, 1989; Noone et al., 2009; Donaldson et al., 2010; Muratore, Earl, 2011）。对于退休准备的具体工作与娱乐方面，有研究表明，对未来休闲活动进行规划的退休者可能有明确的退休目标，从而增强其退休后的幸福感与满足感（Topa et al., 2009）。并且也有研究表明，退休准备有助于促进老年就业，研究者发现退休前的计划往往与退休后的工作活动存在一定关系（Maestas, 2010）。在此基础上，本文提出：

研究假设 1：退休准备对老年福祉的增进有正向影响。

研究假设 2：不同的退休准备方式对老年福祉的影响程度不同。

研究假设 3：退休准备活动中，储备资金对老年福祉的影响程度最大。

男女在退休准备上是存在差异的。过往有研究认为，女性的退休准备目标规划整体上相较于男性更缺乏（Ostuw et al., 1999）。在不同内容上，相较于女性，男性在经济上的准备更加充足，而女性的更加重视准备心理、休闲活动等方面（Lee, 2003）。同时，由于慢性疾病、社会经济地位等方面原因，

老年群体的生活状况也是呈现性别差异的（姜向群等，2015；曾通刚等，2019）。在此基础上，本文提出：

研究假设 4：退休准备对老年福祉的影响存在性别差异。

4. 3 数据及技术路线

4. 3. 1 数据来源

本研究采用 2017 年中国老年社会追踪调查个人问卷的数据，作为本研究的分析样本。中国老年社会追踪调查（CLASS）是由 985 专项经费支持、中国人民大学中国调查与数据中心负责开展的一项全国性社会调查项目。该调查以团队为单位到抽取的社区和家庭中完成问卷的入户面访工作。数据的访问对象是 60 周岁及以上的中国老年人群。2017 年该调查完成的居民个人问卷为 11494 份，本研究对问卷中回答了“对于退休这一事件，您在退休前主要做了哪些准备？”的样本进行了进一步筛选，考虑到其中农业户口的样本太少以及城市人口的退休问题更具典型性，本研究仅选取回答了该问题的非农业户口的受访者作为分析样本，最终整理出有效样本 1564 份。

4. 3. 2 变量选取及说明

1. 因变量说明

老年福祉为本研究的因变量。通过文献梳理后得知，老年福祉是一个多维度的概念，由于不同学者的研究对象与使用的数据存在差异，对老年福祉的测量标准和维度划分还未能达成共识。本文参考过往对老年福祉的研究，结合本研究的数据可得性，构建了老年福祉的评价框架，并将老年期福祉划分为主观福祉和客观福祉两个维度进行测量。

（1）老年福祉的测量维度

第一个维度是主观福祉，选择生活满意度和自我效能感两个指标衡量。其中，生活满意度通过“总的来说，您对您目前的生活感到满意吗？”这一题目进行测量，回答分为很“不满意、比较不满意、一般、比较满意和很满意”

五个等级。自我效能感量表共有 6 个问题，分“不采取、偶尔采取、有时采取、经常采取”四级测量。将各项问题得分加总后取值 6-24，得分越高代表老年人的心理状况越好。

第二个维度是客观福祉，选择基本日常生活活动能力、房产类经济资源、非房产类经济资源、社会保障待遇和社会支持五个指标来衡量。其中基本日常生活活动能力包括：穿衣服、洗澡、吃饭、上厕所、自己从床上移到床边的椅子上、室内走动 6 个项目，所有项目均采用三级测量：1=完全做不了，2=需要一些帮助，3=不需要别人帮助。把量表的 6 项问题得分进行加总取值，得到被调查者的日常生活活动能力状况分值，得分越高代表老人的日常生活活动能力越好，躯体健康水平越好。经济资源中房产与非房产问题都分为三类进行测量，没有房产赋值为 1，一套赋值为 2，两套及以上赋值为 3；非房产的赋值为：1=没有，2=仅现金储蓄，3=除现金以外的其它资产。社会保障待遇主要包括了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金、机关事业单位养老保险金、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金、最低生活保障金和贫困救助金。社会支持通过社会支持与社会网络量表进行测量。社会支持包含“您一个月至少能与几个家人/亲戚见面或联系？”“您能和几个家人/亲戚放心地谈您的私事？”等 6 个问题。回答分别为“没有、1 个、2 个、3-4 个、5-8 个、9 个及以上”，依次计 0-5 分，累加得到老年人的社会支持得分，总分在 0-30 之间。根据以前的研究，量表得分小于 12 意味着个体处于社会隔离的状态，个体得分大于 12 则被识别为社会支持（Rubinstein et al., 1994; Lubben et al., 2004）。因此，本研究在量表得分计总的基础上将指标划分为二分变量，“0”代表得分低于 12 的老年人，代表缺乏社会支持，“1”表示得分为 12-30 的群体，代表有社会支持。

（2）指标权重的确定

由于原始数据量纲的不统一，需要对各项指标进行标准化处理。其中，正向指标越大越好，逆向指标越小越好。对于正向指标，参照公式：

$$Y_i = \frac{X_i - X_{\min}}{X_{\max} - X_{\min}}$$

对于负向指标，参照公式：

$$Y_i = \frac{X_{\max} - X_i}{X_{\max} - X_{\min}}$$

其中， X_{\max} 为指标的最大值， X_{\min} 为指标的最小值。

由于各维度的具体指标在讨论老年福祉的贡献度不同，因此本研究采用加权的方式计算，而不是线性加总；主要使用变异系数法与归一化处理后赋权的方法确定权重。

变异系数又称“标准差率”，通过变异系数的方法确定权重即是根据各维度的各项指标数值的变异程度进行赋权。指标值的变异程度越大，代表其波动程度越大，从而对整个老年福祉系统的结果影响程度越大，代表需要给予更多权重。具体步骤如下。

首先计算各指标的平均值与标准差：

$$\bar{x}_j = \frac{\sum_{i=1}^m x_{ij}}{m} \quad (i=1, 2, \dots, m; j=1, 2, \dots, n)$$

$$\sigma_i = \sqrt{\frac{\sum_{i=1}^m (x_{ij} - \bar{x}_j)^2}{m}} \quad (i=1, 2, \dots, m; j=1, 2, \dots, n)$$

然后通过以下步骤使用各指标的平均值与标准差计算各指标的变异系数：

$$v_j = \frac{\sigma_j}{\bar{x}_j} \quad (j=1, 2, \dots, n)$$

接着对计算出的各变异系数进行归一化处理（将其归纳到统一样本的数据分布性），得到的归一化后的变异系数计算所需指标的各项权重：

$$\omega_j = \frac{v_j}{\sum_{j=1}^n v_j}$$

最后计算第*i*个样本的老年福祉指数： $W_i = \sum_{j=1}^{12} \omega_j c_{ij}$ 。

其中， ω_j 为第*j*个指标的权重， c_{ij} 为原始数据归一化后的数值。对于正向指标，参照公式： $c_{ij} = \frac{x_{ij} - X_{\min}}{X_{\max} - X_{\min}}$ (*i*=1, 2, ..., *m*; *j*=1, 2, ..., *n*)，对于反向指标，参照公式： $c_{ij} = \frac{X_{\max} - x_{ij}}{X_{\max} - X_{\min}}$ (*i*=1, 2, ..., *m*; *j*=1, 2, ..., *n*)。

计算后的老年福祉评价指标体系具体如下表4-1所示。

表 4-1 老年福祉评价指标体系

维度	指标	指标说明	权重
主观福祉	生活满意度	1=很不满意, 2=比较不满意, 3=一般, 4=比较满意, 5=很满意	0.106
	自我效能感	取值 6-24	0.084
客观福祉	日常生活活动能力	取值 6-18	0.027
	房产类经济资源	1=没有, 2=1 套, 3=2 套及以上	0.090
	非房产类经济资源	1=没有, 2=仅现金储蓄, 3=除现金以外的其它资产	0.214
	社会保障待遇	1=有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金、机关事业单位养老保险金、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金, 2=仅有最低生活保障金或贫困救助金, 3=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金、机关事业单位养老保险金、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金、最低生活保障金和贫困救助金都没有	0.107
	社会支持	0=缺乏社会支持, 1=有社会支持	0.371

2.自变量与控制变量说明

表 4-2 变量说明及赋值

	变量名	性质	变量赋值
自变量	退休准备	分类变量	1=没有准备, 2=储备资金(如存款或投资), 3=调整心态, 4=改变生活方式, 5=寻找继续工作的机会, 6=筹划休闲娱乐活动
控制变量	性别	二分变量	0=女, 1=男
	年龄	分类变量	1=60-69岁, 2=70-79岁, 3=80岁及以上
	婚姻状况	二分变量	0=丧偶、离婚和未婚, 1=已婚有配偶
	文化程度	分类变量	1=小学及以下, 2=初中, 3=中专及高中, 4=大专及以上

如表 4-2 所示, 本研究通过问卷中“对于退休这一事件, 您在退休前主要做了哪些准备?”这一问题测量研究对象的退休准备情况, 鉴于问卷的局限性和数据的可操作化, 本研究将仅选择回答中第一位的退休准备作为自变

量。将首要退休准备作为分类变量对其选项依次赋值：回答“没有准备”赋值为1；“储备资金（如存款或投资）”赋值为2；回答“调整心态”赋值为3；回答“改变生活方式”赋值为4；回答“寻找继续工作的机会”赋值为5；回答“筹划休闲娱乐活动”赋值为6。

另外，本研究在控制个体因素的基础上，探究首要退休准备对老年福祉的净影响，因此将性别、年龄、婚姻状况、文化程度作为控制变量。其中，性别和婚姻状况是二分变量，年龄和文化程度是分类变量。将年龄分为“60-69岁”、“70-79岁”、“80岁及以上”三组，文化程度则划分为“小学及以下”、“初中”、“中专及高中”和“大专及以上”四组。

4.4 统计方法

本文采用 SPSS 作为统计软件对样本数据进行分析，首先对研究对象的基本情况以及退休准备情况进行描述统计，通过 k 均值聚类分析法将老年福祉水平划分为不同类别并对其进行描述分析。k 均值聚类是一种迭代求解的聚类分析算法，首先选择 k 个观测量作为初始的聚类中心点，根据距离最小的原则将各个观测量分配到这 k 个类中；然后将每一个类中的观测量计算变量均值，这 k 个均值又形成新的 k 个聚类中心点。依次类推，不断进行迭代，直到收敛或达到分析者的要求为止。

最后本文采用有序多分类 logistic 回归分析探讨退休准备对老年福祉的影响。有序多分类 logistic 回归基于累计概率，假设因变量 Y 是有 g 个类别(Y=1, 2, ..., g) 的多分类有序变量，m 个自变量 X_1, X_2, \dots, X_m ，构建回归模型如下：

$$\ln\left(\frac{P(Y \leq j)}{1 - P(Y \leq j)}\right) = \beta_{0j} + \beta_1 X_1 + \beta_2 X_2 + \dots + \beta_m X_m$$

式中， $j=1, 2, \dots, g-1$ 。有序多分类 logistic 回归包括 $g-1$ 个方程， β_{0j} 为第 j 个回归方程的常数项， β_m 为自变量 X_m 的回归系数。

5 退休准备与老年福祉的描述性分析

本章首先对样本的基本情况与退休准备情况进行描述，随后评估研究对象的老年福祉水平，对计算出的老年福祉指数进行聚类分析与描述统计。

5.1 样本基本情况

如表 5-1 所示，本研究的 1564 个样本在性别分布上差异较小，女性占 49.7%，男性占 50.3%。在年龄段分布上，60-69 岁低龄老年人占比最高，为 58.9%，70-79 年龄段的老年人占 30.1%，80 岁及以上的老年人最少，占比仅为 11.0%。样本中已婚有配偶的老人比例远高于丧偶、离婚和未婚老人，占比分别为 77.7% 和 22.3%。本样本中老年人的初中文化水平比例相对较高，占样本量的 45.1%，其次是小学及以下、中专及高中和大专及以上，分别占样本量的 26.2%、21.0% 和 7.7%。

表 5-1 样本的基本特征

	频数（人）	百分比（%）
性别		
女	778	49.7
男	786	50.3
年龄组		
60-69 岁	921	58.9
70-79 岁	471	30.1
80 岁及以上	172	11.0
婚姻状况		
已婚有配偶	1215	77.7

丧偶、离婚和未婚	349	22.3
文化程度		
小学及以下	410	26.2
初中	705	45.1
中专及高中	328	21.0
大专及以上	121	7.7
合计	1564	100.0

5. 2 退休准备情况

从表 5-2 可以看出，尽管没有进行过退休准备这一活动的老年人整体上略少于有退休准备的人数，但其占比仍然较高。在进行了退休准备的人群中，首要退休准备为调整心态的老人最多，占总体样本的 26.2%，其次是改变生活方式、储备资金，分别占比 12.2% 和 11.6%。寻找继续工作的机会和筹划休闲娱乐活动的老人最少，仅占总样本量的 3.3% 和 1.8%。

表 5-2 样本退休准备的基本情况

	频数 (人)	百分比 (%)
没有准备	703	44.9
储备资金	181	11.6
调整心态	409	26.2
改变生活方式	191	12.2
寻找继续工作的机会	52	3.3
筹划休闲娱乐活动	28	1.8
合计	1564	100.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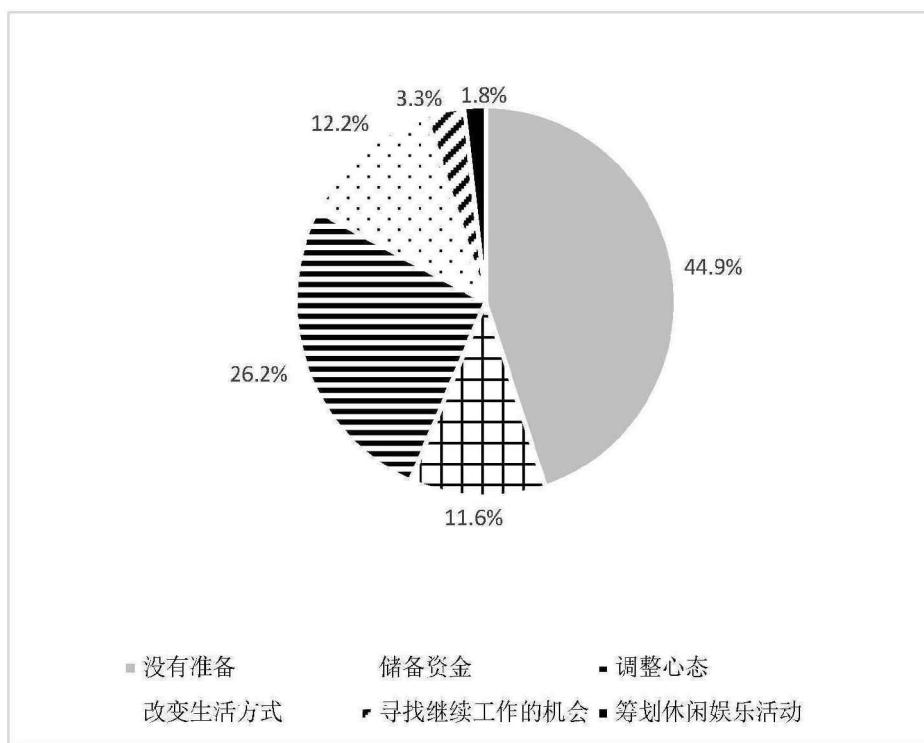


图 5-1 退休准备基本情况

表 5-3 显示，从性别分布上看，在没有准备的人群中，女性占比略高于男性，为 52.3%。在储备资金、调整心态、改变生活方式、寻找继续工作的机会几项首要退休准备方式中，女性占比均比男性少，其中调整心态和改变生活方式两项准备占比最为接近。而在筹划休闲娱乐活动中，男性占比低于女性。

从年龄分布上看，没有退休准备、储备资金、调整心态、改变生活方式以及寻找继续工作的机会几项退休准备中 60-69 岁的老人占比均为最高，70-79 岁年龄组其次。但是在筹划休闲娱乐活动这一首要退休准备中，70-79 岁的老年人所占比例最高，为 39.3%。80 岁及以上老年人在各项准备中占比均为最低，分别为 11.4%、7.7%、9.0%、15.7%、7.7%、25.0%，这可能是由于 80 岁及以上老人样本在总样本中的比例较低造成的。

从婚姻状况的样本分布来看，没有退休准备的老人中，已婚有配偶的老人占比远高于丧偶、离婚和未婚老人，其比例分别为 77.2% 和 22.8%。在其余各项退休准备中，已婚有配偶的老年人所占比例也均高于丧偶、离婚和未婚老人。

从文化程度来看，在各项首要退休准备中，初中文化水平的老人占比均为最高，大专及以上老年人的比例均最低。在没有退休准备、调整心态、改变生活方式以及筹划休闲娱乐活动中，小学及以下文化程度占比高于中专及高中文化的老人，而在储备资金和寻找继续工作的机会两项退休准备中，中专及高中文化程度的老人占比更高。

表 5-3 不同人口学特征的退休准备状况 (%)

	没有准备	储备资金	调整心态	改变生活方式	寻找继续工作的机会	筹划休闲娱乐活动
性别						
女	52.3	39.8	49.9	49.2	38.5	71.4
男	47.7	60.2	50.1	50.8	61.5	28.6
年龄组						
60-69岁	59.2	59.7	60.1	56.5	63.5	35.7
70-79岁	29.4	32.6	30.8	27.7	28.8	39.3
80岁及以上	11.4	7.7	9.0	15.7	7.7	25.0
婚姻状况						
已婚有配偶	77.2	80.7	78.5	77.0	75.0	67.9
丧偶、离婚和未婚	22.8	19.3	21.5	23.0	25.0	32.1
文化程度						
小学及以下	30.3	14.9	26.4	22.5	19.2	32.1
初中	44.4	48.1	42.8	49.7	48.1	39.3
中专及高中	19.2	26.0	21.3	19.9	26.9	25.0
大专及以上	6.1	11.0	9.5	7.9	5.8	3.6

5.3 老年福祉现状评估

本文利用 k 均值聚类方法，将计算出的老年福祉指数聚类为 3 类，即低老年福祉、中等老年福祉、高老年福祉。单因素方差分析（ANOVA）的组间均方差（26.550）大于组内均方差（0.003），显著性水平为 0.000，表明方差分析的有效性好，且 3 种分类之间存在显著差异。这表示将样本老人依据老

年福祉指数的高低分为 3 类具有合理性。由表 5-5 可以看出，在所有的老年人样本中，低老年福祉所占比例为 27.9%，老年福祉指数均值为 0.369；中等老年福祉所占比例为 26.2%，老年福祉指数均值为 0.672；高老年福祉所占比例为 45.8%，老年福祉指数均值为 0.809。

表 5-4 老年福祉指数聚类结果

	老年福祉指数范围	聚类均值	样本量	百分比(%)
低老年福祉	0.159<W<0.517	0.369	437	27.9
中等老年福祉	0.522<W<0.739	0.672	410	26.2
高老年福祉	0.744<W<0.984	0.809	717	45.8

从表 5-6 可以看出，三种类别的老年福祉在性别分布上的差异都较小，在老年福祉水平较低的人群中，男性比例略高于女性。而中等老年福祉和高老年福祉水平中的老年人，女性占比均略高于男性。

从年龄分布上看，三种老年福祉水平中占比最高的均是 60-69 岁老人，其占比分别为 57.9%、58.5%、59.7%，其次是 70-79 岁年龄组的老人，占比最低的是 80 岁以及上老人。

三种不同水平的老年福祉的不同婚姻状况的老年样本中分布差异明显，已婚有配偶的老人在低老年福祉、中等老年福祉和高老年福祉三种类别中的占比均显著高于丧偶、离婚和未婚的老人。

从不同文化程度来看，三种老年福祉中占比最高的均为初中文化程度的老人，比例最低的是大专及以上老人人口，其占比分别为 6.4%、7.6%、8.6%。在低老年福祉与中等老年福祉的两种水平中，小学及以下文化程度相较于中专及高中文化的老人占比更高，在高老年福祉水平中，小学及以下与中专及高中文化程度的样本占比差异较小，分别是 20.9% 与 21.1%。

表 5-5 不同人口学特征的老年福祉状况 (%)

	低老年福祉	中等老年福祉	高老年福祉
性别			
女	48.5	50.5	50.1
男	51.5	49.5	49.9

年龄组			
60-69岁	57.9	58.5	59.7
70-79岁	31.1	29.3	30.0
80岁及以上	11.0	12.2	10.3
婚姻状况			
已婚有配偶	74.6	76.3	80.3
丧偶、离婚和未婚	25.4	23.7	19.7
文化程度			
小学及以下	28.1	33.4	20.9
初中	43.7	39.0	49.4
中专及高中	21.7	20.0	21.1
大专及以上	6.4	7.6	8.6

在已构建的老年福祉评价指标基础上，对比不同样本群体的老年福祉指数均值发现，没有退休准备、有退休准备与整体样本的均值差异较明显。如图 5-2 所示，整体来看，有退休准备的人群其主观福祉、客观福祉及老年福祉指数均值都高于没有进行过退休准备这一活动的老人及总体样本均值。其中，没有退休准备的老人其主观福祉、客观福祉与老年福祉均值最低，分别为 0.122、0.497 与 0.619。有退休准备的老人，其各项福祉均为最高，分别是 0.127、0.549 与 0.676，其客观福祉与老年福祉的指数均值与没有退休准备的老人相较差异最大。总体样本的各项福祉指数均值分别是 0.125、0.525、0.65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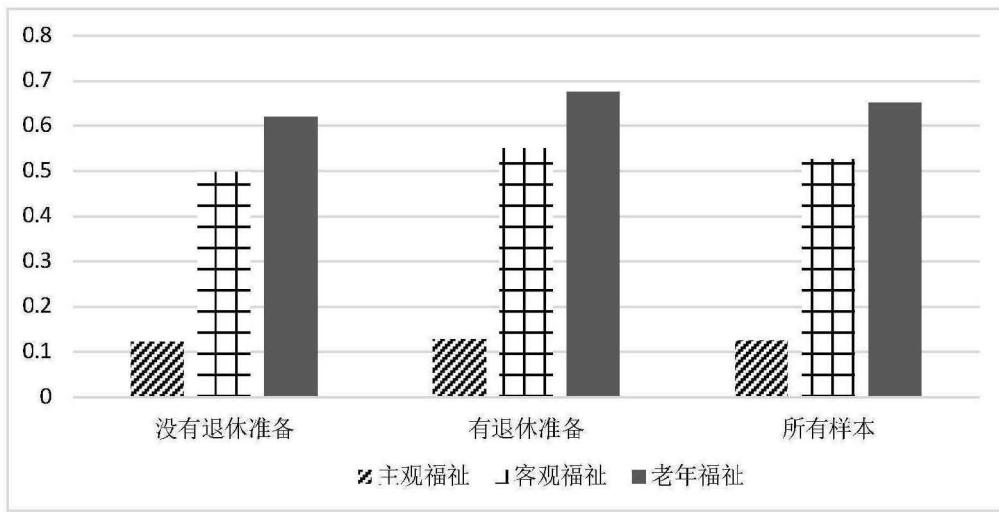


图 5-2 老年福祉指数均值的分布

图 5-3 中在没有准备的老年人中老年福祉指数分布更集中，但其指数极值相较于其他有准备的人群来说更低，最低值为 0.176。首要退休准备为储备资金与改变生活方式的样本老年福祉指数主要集中在较高水平，其离散程度大于没有准备的老人。与其它退休准备相比，调整心态的老人其福祉指数最高，最高值为 0.984，且分布较为集中。首要退休准备为寻找继续工作的机会与筹划休闲娱乐的样本内部较离散，但其老年福祉指数始终保持在较高水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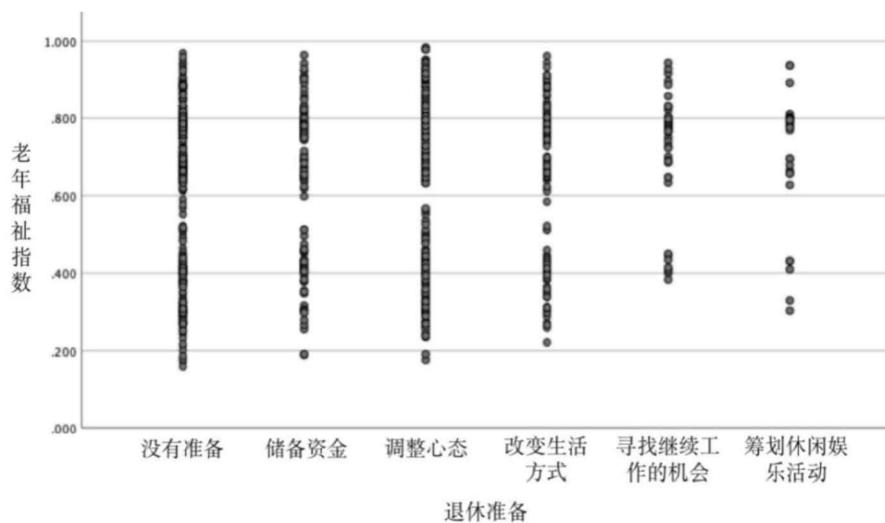


图 5-3 不同退休准备方式下的老年福祉指数

在老年福祉指数聚类分析结果的基础上，对比不同退休准备状况的老人在不同老年福祉水平上的分布，发现三种老年福祉类别的呈现出明显的分布差异。如下图 5-4 所示，没有准备的老人在低老年福祉和中等老年福祉中占比均为最高，超过了 50%，其次是首要准备为调整心态的老人，寻找继续工作的机会与筹划休闲娱乐活动的占比最低。在低老年福祉的水平上，首要退休准备为储备资金高于改变生活方式的老人占比，中等老年福祉中则是首要退休准备为改变生活方式的老人占比更高。在高老年福祉水平上，没有准备的老人占比明显降低，不足 40%。在有退休准备的老人中，其占比从高到低依次是调整心态、改变生活方式、储备资金、寻找继续工作的机会、筹划休闲娱乐活动，其中储备资金与改变生活方式的比例较为接近，分别为 13.0% 与 13.8%。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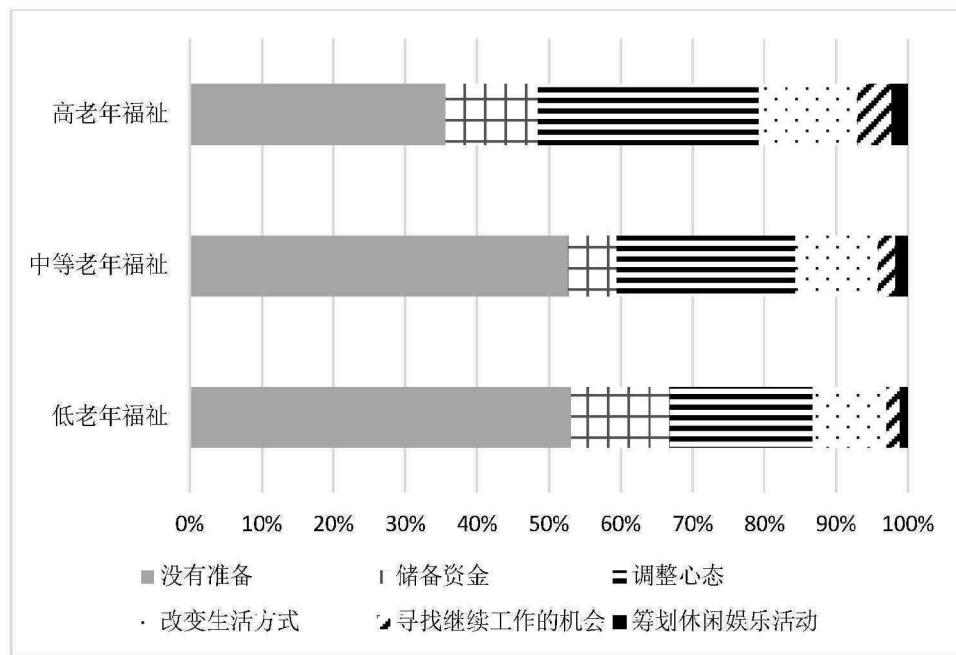


图 5-4 不同退休准备方式在老年福祉上的分布

5.4 本章小结

本章描述了调查数据中样本的基本情况、样本老人的退休准备情况，在评估老年福祉指数的基础上对老年福祉水平进行了聚类分析，并对其进行描述性分析。

第一，样本老年人性别分布较为均匀，年龄主要集中在 60-69 岁，80 岁及以上的老年样本最少，婚姻状况分布差异较大，以已婚有配偶的老年群体为主。文化程度主要集中在初中文化水平。

第二，有退休准备的老人略多于没有退休准备的老人，这说明退休准备还未得到足够重视。而首要退休准备的方式以储备资金、调整心态、改变生活方式为主。

第三，在没有准备的人群中，女性占比略高于男性。在几种首要退休准备方式中，女性占比均比男性少，提示女性对退休准备的重视程度低于男性。不同首要退休准备方式在年龄组、婚姻状况与文化程度的分布中均呈现出较大差异，这可能是由样本分布不均的原因造成的。

第四，将计算出的老年福祉指数划分为低老年福祉、中等老年福祉、高老年福祉三个层级之后发现，在所有的老年人样本中，中等老年福祉所占比例最低，高老年福祉样本占比最高；男性老人的福祉水平整体高于女性老人。就不同的退休准备方式而言，没有准备的老人福祉低于有退休准备的老人；有退休准备的老人中，首要准备方式为调整心态的老人福祉水平相对更高。

6 退休准备对老年福祉的影响

在对样本基本情况、退休准备情况和老年福祉现状的描述性分析基础上，将自变量与三类不同的老年福祉水平纳入到回归模型中，进行有序多分类 logistic 回归分析，并进一步探讨退休准备对老年福祉影响的性别差异。

6.1 退休准备对老年福祉的影响分析

根据研究假设，本小节将从储备资金、调整心态、改变生活方式、寻找继续工作的机会、筹划休闲娱乐活动几方面探讨退休准备对老年福祉的影响。因此，本文将退休准备作为自变量，性别、年龄、婚姻状况、文化程度作为控制变量，老年福祉评价指标体系计算出的指数进行聚类分析后分为了三种不同的老年福祉类别，将低老年福祉、中等老年福祉与高老年福祉分别赋值为 1、2、3，作为因变量进行分析。本文考虑到控制变量与自变量的交互作用，先后建立 2 个模型，进行逐步回归。其中，模型一考察了不考虑任何控制变量时，退休准备对老年福祉的关系；模型二在模型一的基础上，加入控制变量后考察退休准备对老年福祉的影响。

表 6-1 给出了退休准备对老年福祉影响的回归分析结果，模型一的回归结果显示，退休准备中储备资金、调整心态、改变生活方式、寻找继续工作的机会和筹划休闲娱乐活动相较于没有准备的老人，均有显著的正向影响。但是该模型的平行线假设结果显示 $\chi^2=13.721$, $p=0.017<0.05$ ，表明该模型存在高度共线性，并未通过平行线检验。

模型二在模型一的基础上纳入了控制变量。该模型的拟合信息结果分析显示拒绝原假设 ($\chi^2=61.584$, $p=0.000<0.001$)，表明本次构建模型具有统计学意义，该模型成立。基于拟合优度检验中的 Pearson 卡方和偏差卡方结果

($p>0.05$) 显示，模型拟合较好。平行线检验结果显示比例优势假设成立 ($\chi^2=14.453$, $p=0.107>0.05$)，模型通过平行线检验，可进一步进行分析。

从下表 6-1 可以看出。相较于没有任何准备，其他各项退休准备都与老年福祉水平具有显著性关系。具体来看，首要退休准备中储备资金对老年福祉产生显著的正向影响 ($p=0.005<0.01$)；调整心态、改变生活方式和寻找继续工作的机会与老年福祉水平呈现高度显著正相关 ($p=0.000<0.001$)；筹划休闲娱乐活动也对老年福祉有显著正向影响 ($p=0.046<0.05$)。总之，有退休准备的老人比没有任何退休准备的老人，其老年福祉水平更高，这支持了研究假设 1。

表 6-1 退休准备对老年福祉影响的回归分析

	模型一	模型二
常量 1	-0.877*** (0.058)	-0.668*** (0.151)
常量 2	0.004 (0.049)	0.216 (0.149)
控制变量		
性别	-	-0.095 (0.072)
年龄	-	-0.025 (0.054)
婚姻状况	-	0.209* (0.088)
文化程度	-	0.080 (0.041)
自变量		
退休准备（参照组：没有准备）		
储备资金	0.347** (0.115)	0.324** (0.116)
调整心态	0.491*** (0.088)	0.481*** (0.088)
改变生活方式	0.425*** (0.115)	0.411*** (0.115)
寻找继续工作的机会	0.864*** (0.241)	0.866*** (0.241)
筹划休闲娱乐活动	0.602* (0.296)	0.589* (0.296)
样本量	1564	1564

注：***表示 $P<0.001$, **表示 $P<0.01$, *表示 $P<0.05$

表 6-2 是模型二自变量的 OR 值统计结果。可见，首要退休准备为储备资金的老人，其老年福祉水平达到更高一级可能性是没有任何退休准备的老人的 1.383 倍（ $OR=1.383$ ）；首要退休准备为调整心态的老人，其老年福祉水平达到更高一级可能性是没有任何退休准备的老人的 1.618 倍（ $OR=1.618$ ）；首要退休准备为改变生活方式的老人，其老年福祉水平达到更高一级概率是没有任何退休准备的老人的 1.508 倍（ $OR=1.508$ ）；首要退休准备为寻找继续工作的机会的老人，其老年福祉水平达到更高一级可能性是没有任何退休准备的老人的 2.377 倍（ $OR=2.377$ ）；首要退休准备为筹划休闲娱乐活动的老人，其老年福祉水平达到更高一级可能性是没有任何退休准备的老人的 1.802 倍（ $OR=1.802$ ）。上述结果表明不同的退休准备方式对老年福祉的影响程度不同，支持了研究假设 2。但是寻找继续工作的机会对老年福祉水平产生的影响作用最大，筹划休闲娱乐活动次之，储备资金对老年福祉水平的影响程度最小。研究假设 3 并未得到支持。

表 6-2 模型二的 OR 值统计结果

自变量	OR 值	OR 值的 95% 置信区间	
		下限	上限
储备资金	1.383	1.101	1.736
调整心态	1.618	1.361	1.922
改变生活方式	1.508	1.204	1.890
寻找继续工作的机会	2.377	1.482	3.813
筹划休闲娱乐活动	1.802	1.009	3.219

6.2 退休准备对老年福祉影响的性别差异

根据研究假设，本小节将分别讨论在男性和女性样本中，退休准备对老年福祉的影响及其差异。模型三与模型四讨论了女性样本中退休准备对老年福祉的影响，模型五与模型六则是男性的退休准备对老年福祉的影响。模型三与模型五是只纳入自变量，模型四和模型六在此基础上引入了控制变量。

表 6-3 是不同性别的退休准备对老年福祉产生影响的回归结果。

模型三的拟合信息结果分析显示拒绝原假设 ($\chi^2=19.412$, $p=0.002<0.01$) , 拟合优度检验中的 Pearson 卡方和偏差卡方结果 ($p>0.05$) 显示模型拟合较好。平行线检验结果显示平行线假设成立 ($\chi^2=3.222$, $p=0.666>0.05$) 。该模型的回归结果显示, 储备资金、调整心态、改变生活方式、寻找继续工作的机会均对老年福祉产生显著的正向影响, 其中调整心态对老年福祉的影响最显著 ($p=0.003<0.01$) , 但是筹划休闲娱乐活动与女性老年福祉并没有显著相关关系。

模型四的拟合信息结果分析表明本次构建的模型成立 ($\chi^2=30.873$, $p=0.000<0.001$) 。基于拟合优度检验中的 Pearson 卡方和偏差卡方结果 ($p>0.05$) , 说明模型拟合较好。平行线检验结果显示比例优势假设成立 ($\chi^2=6.775$, $p=0.561>0.05$) , 模型的平行线检验通过。从回归分析结果来看, 引入控制变量后, 首要退休准备中有四种退休准备方式对女性老年福祉产生显著影响。储备资金对女性老年福祉有显著的正向影响 ($p=0.023<0.05$) ; 调整心态对女性老年福祉产生较高显著的正向作用 ($p=0.007<0.01$) ; 改变生活方式对老年福祉具有显著正向影响 ($p=0.026<0.05$) ; 首要准备为寻找继续工作的机会的女性老人, 其福祉水平比没有任何退休准备的女性老人更高 ($p=0.040<0.05$) 。筹划休闲娱乐活动这一变量系数无统计学意义 ($p=0.068$) , 即在女性样本中, 筹划休闲娱乐活动对老年福祉没有显著影响。

模型五与模型六是男性样本的退休准备对老年福祉影响的回归结果。模型五的拟合信息结果分析显示本次构建的模型成立 ($\chi^2=35.401$, $p=0.000<0.001$) , 基于拟合优度检验中的 Pearson 卡方和偏差卡方结果 ($p>0.05$) , 说明模型拟合较好。平行线检验结果显示比例优势假设成立 ($\chi^2=10.944$, $p=0.052>0.05$) , 模型通过平行线检验。其回归结果显示, 储备资金、调整心态、改变生活方式、寻找继续工作的机会几项退休准备均对老年福祉产生显著的正向影响, 其中调整心态对老年福祉的影响最显著 ($p=0.000<0.001$) , 筹划休闲娱乐活动对男性老年福祉没有显著影响。

模型六的拟合信息结果分析显示本次构建的模型具有统计学意义 ($\chi^2=36.768$, $p=0.000<0.001$) 。拟合优度检验中的 Pearson 卡方和偏差卡方结果 ($p>0.05$) 表明模型拟合较好。平行线检验结果显示比例优势假设成立 ($\chi^2=13.507$, $p=0.096>0.05$) , 模型通过平行线检验, 可进一步进行分析。该

模型结果显示，引入控制变量后，首要退休准备中有三种退休准备方式对男性老年福祉具有显著影响。具体而言，储备资金对男性老年福祉的影响在本模型中无法明确（ $p=0.058$ ）；调整心态对男性老年福祉具有非常明显的正向作用（ $p=0.000<0.001$ ）；首要准备为改变生活方式的男性老人比没有任何准备的男性老人福祉水平更高（ $p=0.005<0.01$ ）；寻找继续工作的机会与男性老年福祉呈现明显的正相关关系（ $p=0.003<0.01$ ）；筹划休闲娱乐活动对男性老年福祉不具有显著影响（ $p=0.442$ ）。

表 6-3 退休准备对老年福祉影响的分性别回归分析

	女性样本		男性样本	
	模型三	模型四	模型五	模型六
常量 1	-0.945*** (0.082)	-0.614** (0.211)	-0.808*** (0.081)	-0.677** (0.219)
常量 2	-0.046 (0.068)	0.291 (0.207)	0.058 (0.070)	0.189 (0.215))
控制变量				
年龄	- -	-0.031 (0.082)	- -	-0.024 (0.073)
婚姻状况	- -	0.291** (0.112)	- -	0.087 (0.145)
文化程度	- -	0.112 (0.059)	- -	0.057 (0.058)
自变量				
退休准备（参照组：没有准备）				
储备资金	0.442* (0.187)	0.428* (0.188)	0.309* (0.148)	0.283 (0.149)
调整心态	0.356** (0.121)	0.329** (0.121)	0.633*** (0.127)	0.627*** (0.127)
改变生活方式	0.382* (0.164)	0.366* (0.164)	0.474** (0.162)	0.459 ** (0.162)
寻找继续工作的机会	0.803* (0.386)	0.790* (0.384)	0.926** (0.310)	0.921** (0.311)
筹划休闲娱乐活动	0.650 (0.364)	0.667 (0.365)	0.426 (0.508)	0.391 (0.510)
样本量	778	778	786	786

注：***表示 $P<0.001$ ，**表示 $P<0.01$ ，*表示 $P<0.05$

在回归结果的基础上,表 6-4 是模型四各项首要退休准备的 OR 值统计结果。首要退休准备为储备资金的女性老人,其老年福祉水平达到更高一级概率是没有任何退休准备的女性老人的 1.534 倍 ($OR=1.534$) ; 首要退休准备为调整心态的女性老人,其老年福祉水平达到更高一级可能性是没有任何退休准备的女性老人的 1.390 倍 ($OR=1.390$) ; 首要退休准备为改变生活方式的女性老人,其老年福祉水平达到更高一级概率是没有任何退休准备的女性老人的 1.442 倍 ($OR=1.442$) ; 首要退休准备为寻找继续工作的机会的女性老人,其老年福祉水平达到更高一级可能性是没有任何退休准备的女性老人的 2.203 倍 ($OR=2.203$) ; 筹划休闲娱乐活动对女性老年福祉的影响程度在本模型中无法明确 ($p=0.068$, 95%CI: 0.953-3.984) 。在女性样本中,对老年福祉影响程度由高到低的首要退休准备方式依次是寻找继续工作的机会、储备资金、改变生活方式、调整心态。

表 6-4 模型四的 OR 值统计结果

自变量	OR 值	OR 值的 95% 置信区间	
		下限	上限
储备资金	1.534	1.061	2.218
调整心态	1.390	1.096	1.761
改变生活方式	1.442	1.046	1.989
寻找继续工作的机会	2.203	1.038	4.677
筹划休闲娱乐活动	1.948	0.953	3.984

表 6-5 是模型六各项首要退休准备的 OR 值统计结果。储备资金在本模型中的 OR 值无统计意义 ($p=0.058$, 95%CI: 0.991-1.777) ; 首要退休准备为调整心态的男性老人,其老年福祉水平达到更高一级可能性是没有任何退休准备的男性老人的 1.872 倍 ($OR=1.872$) ; 首要退休准备为改变生活方式的男性老人,其老年福祉水平达到更高一级概率是没有任何退休准备的男性老人的 1.582 倍 ($OR=1.582$) ; 首要退休准备为寻找继续工作的机会的男性老人,其老年福祉水平达到更高一级可能性是没有任何退休准备的男性老人的 2.512 倍 ($OR=2.512$) ; 筹划休闲娱乐活动对男性老年福祉的影响程度在本模型中无法明确 ($p=0.442$, 95%CI: 0.544-4.017) 。在男性样本中,调整心

态是对老年福祉水平影响最高的首要退休准备因素，其次是调整心态，影响程度最低的是改变生活方式。

表 6-5 模型六的 OR 值统计结果

自变量	OR 值	OR 值的 95% 置信区间	
		下限	上限
储备资金	1.327	0.991	1.777
调整心态	1.872	1.459	2.401
改变生活方式	1.582	1.152	2.174
寻找继续工作的机会	2.512	1.365	4.621
筹划休闲娱乐活动	1.478	0.544	4.017

综上，女性老年人主要是通过储备资金、调整心态、改变生活方式、寻找继续工作的机会四项首要退休准备对老年福祉产生正向影响，筹划休闲娱乐活动对女性老年福祉的影响在本模型中无法明确。男性老年人则是通过调整心态、改变生活方式和寻找继续工作的机会三种首要退休准备方式对其福祉水平产生正向作用。在女性样本中，对老年福祉影响程度由高到低依次是寻找继续工作的机会、储备资金、改变生活方式、调整心态。在男性样本中，对其老年福祉影响程度由高到低依次是寻找继续工作的机会、调整心态、改变生活方式。因此，退休准备对老年福祉的影响在性别上存在差异，从而支持了研究假设 4。

6.3 本章小结

本章对退休准备对老年福祉的影响及其性别差异进行了实证分析，因变量为聚类后的三种老年福祉水平，自变量是退休准备。

第一，总体样本的模型结果显示，相较于没有任何退休准备，各项退休准备方式均对老年福祉产生了显著的正向影响，且各自的影响程度不同，寻找继续工作的机会对老年福祉影响最大。

第二，女性样本的模型结果显示，有四项退休准备对老年福祉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分别是储备资金、调整心态、改变生活方式、寻找继续工作的机

会，而筹划休闲娱乐活动对老年福祉没有呈现显著影响。男性样本的模型结果显示，仅有调整心态、改变生活方式和寻找继续工作的机会三项首要退休准备对老年福祉水平产生显著的正向影响。在女性样本中，对老年福祉影响程度由高到低的首要退休准备方式依次是：寻找继续工作的机会、储备资金、改变生活方式、调整心态。在男性样本中，对其老年福祉影响程度由高到低依次是寻找继续工作的机会、调整心态、改变生活方式。

7 研究发现及讨论

7.1 研究发现

在对调查样本进行数据分析的基础上，本研究有以下发现：

1.没有退休准备的老年人比例较高；在有退休准备的老年人中，不同的首要退休准备方式的分布差异较大，主要集中在储备资金、调整心态、改变生活方式三种准备方式。不同退休准备方式均呈现较大性别差异，女性在储备资金、调整心态、改变生活方式、寻找继续工作的机会四项首要退休准备中占比均比男性少；而男性在筹划休闲娱乐活动的方式上占比低于女性。

2.从低、中、高三种不同的老年福祉水平上看，受访对象的老年福祉状况整体较好，男性老人的福祉水平整体高于女性老人。其中，没有退休准备的老人福祉水平整体低于有退休准备的老人；有退休准备的老人中，首要准备为调整心态的老人福祉水平相对更高。

3.退休准备是老年福祉重要的影响因素之一。在控制人口学变量的基础上，考察退休准备对老年福祉的净影响。结果显示，储备资金、调整心态、改变生活方式、寻找继续工作的机会、筹划休闲娱乐活动几项首要退休准备均对老年福祉有显著正向影响。

4.不同退休准备方式对老年福祉的影响程度不同。寻找继续工作的机会对老年福祉的影响程度最高，其他首要退休准备的影响程度由高到低依次为：筹划休闲娱乐活动、调整心态、改变生活方式、储备资金。

5.退休准备对老年福祉的影响存在性别差异。储备资金、调整心态、改变生活方式、寻找继续工作的机会对女性老年福祉的正向影响显著。在未引入控制变量时，储备资金、调整心态、改变生活方式、寻找继续工作的机会均对男性老年福祉产生显著正向影响，引入控制变量后，仅有调整心态、改变

生活方式和寻找继续工作的机会三项首要退休准备对男性老年福祉水平有显著正向影响。寻找继续工作的机会对女性和男性老年福祉水平的影响程度均是最高，调整心态对女性老年福祉的影响作用最小，而改变生活方式对男性老年福祉的影响程度最低。

7.2 讨论及建议

本文认为，退休准备有别于养老规划，养老规划蕴含着对老年人的衰老、疾病等负面影响，有着不适应生产的消极意涵，退休准备则是老年人在进入老年期之前在经济、心理、再就业、休闲娱乐等多方面的积极再生产准备。在我国老龄化进程中，政府提出了一系列的养老保险政策以保证老年人的社会权益，因此许多人认为，养老保险或退休金就是老年生活幸福的稳定保障，即便有很多退休职工在规划其退休生活时，也仅停留在思想层面或者储蓄资金，而忽略了积极参与社会、丰富老年休闲生活等一系列准备。退休生活是否需要“有产出”地度过，如何规划休闲时间？面对生理衰老与疾病时如何制定健康计划？以及退出劳动市场后，可能面临角色不适应、跟不上社会节奏、与后代观点脱节等问题，这时应如何缓解心理压力？当面临退休时再去考虑上述问题就为时已晚。如果人们对老年生活的各种诉求长期不能得到满足，则会对老年人的晚年幸福生活构成阻碍，积累到一定时期将可能引发许多社会问题。另外，我国的人口老龄化呈现着“未富先老”的特征，在现有的社会保障框架之下，政府的养老负担日益加剧；“养儿防老”、“老有所养”等传统观念使子女也在老年人的生活中扮演重要角色。但是，计划生育的政策实施导致我国独生子女家庭众多，在此背景下，独生子女需要承担更大的责任。因此个体更应该改变传统养老观念，适应社会发展的需要，积极参与退休准备。退休准备中的财务规划可以有效保障退休后的资金充足，社会保险等行业已经开始重视老年人的财务规划问题，并提出了相应的政策建议。但研究结论显示，仍有很大一部分老年人并未重视退休准备这一重要活动，因缺乏相关知识与指导，并未对退休后的生进行科学合理的规划与安排。知识的普及与信息的传播是退休准备问题发展阻碍的重要原因，同时还可能存在相关政策实施不佳的原因。

过往的国内研究基本认为老年人的财务规划是最重要的影响因素，而本研究显示，寻找继续工作的机会对老年福祉的影响作用最大。本研究结果与以往研究结果有所不同的可能原因之一是研究样本的不同导致的差异；此外，也可能是退休准备这一议题最早是在金融保险领域被关注和研究的缘故。资金方面的准备固然重要，但是面临“退休”这一事件的人群，首先是曾经在市场有一定资本积累的劳动力，并且随着我国社会保障制度的不断完善，人们的老年生活已经有了较稳定的经济保障，经济需求已经基本得到了满足。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老年人同样需要追求更高层次的需求。退休后继续工作的计划有利于开发老年人力资源，满足老年人的就业需求，有益于老年人的角色转换适应和可持续生计。同时老年劳动力本身就是宝贵的人力资源，他们所具备的职业能力与工作经验并非一定会随着年龄增长而降低，对于社会某些岗位来说，也是一笔重要的财富。

过往对退休准备的影响研究缺乏性别视角，而本文发现，不同的退休准备方式对老年人的福祉影响存在性别差异，且其影响程度不同。在现代社会中，尽管性别平等观念逐渐被人们接受，社会中各领域间的社会性别差异在逐步减小，但是在社会分工中，男性与女性的角色承担仍然存在着一定差距。因为社会文化对两性的性别角色期待不同，在退休前人们对女性在职场中的角色期待并没有男性高，女性在社会经济地位、社会资源的获得等普遍落后于男性。由于受到传统观念的影响，大部分女性除工作之外还要更多地投入家庭角色，在退休后女性老人也可能会付出更多精力和时间在抚养子孙后代的家庭事务中。而男性由于在退休前其社会地位更高，有一定的社会资本，退休使其从一个公共角色回归到家庭，变为一个情感性角色，社会对男性角色期待的反差大于女性。因此相较于男性老人，调整心态对女性老人福祉的影响程度不大，退休后有个人储蓄计划、继续工作、参与社会活动等可能更容易提高其老年福祉水平。男性在退出劳动力市场后带来的角色不适应等问题可能导致其老年生活获得感较低，因此在劳动市场继续工作、调整心态是其提高老年生活福祉的重要因素。

退休准备议题不仅需要国家层面的政策完善与保障，同时也需要个体具备退休规划的意识和知识技能，因此应该受到社会各界的关注。在研究结论的基础上，本文提出以下政策建议：

1.就我国的社会保障制度而言，养老金制度的改革需要向第二支柱与第三支柱倾斜，即：提高职业养老金与个人养老储蓄在老年经济保障体系中的比重。在政府为退休者提供最基本的养老保障的同时，完善企业层面的养老金计划，并提高公民个人养老储蓄的意识，为老年人生活奠定充足的物质基础。社会养老服务资源在提高覆盖率的同时，更要注重精准投放与提升保障质量，缩小个人养老需求与市场供应的差距，为商业保险、退休产品等提供更大的平台，给予退休者更多的市场选择，提高社会养老资源的可及性。在此基础上，政府应更多的为老年人退休提供制度准备，承担市场的“监管者”责任。

2.推动和规范养老资产管理业务，开拓老年人就业市场，完善社会养老服务行业。整合政府、社区与家庭多方面资源，为老年人提供更加丰富的养老服务。随着人口的平均预期寿命延长，政府在进行政策设计时有必要从老年人的就业诉求出发。要提高老年人的社会参与感，降低其排斥感，注重营造退休再就业的氛围。开发老年人力资源可能会增加市场就业总量，关注老年人的就业需求，开发更合理的老年人口就业岗位，同时开拓新的就业渠道，让老年人力资源在劳动力市场找到合适定位。

3.为帮助公众认识退休准备的重要性和相关知识技能，国家应自上而下加强宣传和指导。增加官方媒体、网络、报刊杂志等宣传力，使人们了解我国退休准备的基本状况和其重要性，也为社会了解政府政策奠定基础。组织退休前教育、退休财务管理等专题讨论会，帮助企业或个人获得更多关于退休准备的科学知识、树立明确清晰的退休目标、奠定心理准备等。

4.社会政策的制定和实施应避免性别盲视。尽管当今社会的性别歧视已经有了很大程度的改善，但是两性在社会参与和社会机会方面依然存在明显差异，这些差异中有一部分是两性生理差别所致，但有很大一部分是性别文化所形塑的。在退休准备相关政策议题中，应考虑到两性在生理、心理和社会属性方面的差异，纳入性别意识，以便有针对性地配置资源，看见老年人的差别化诉求。

7.3 研究贡献

国内研究对退休准备的实证研究较少，过往对退休准备的研究主要是针对财务领域，对退休准备的多样化缺少关注。显然，有关退休准备的研究还有大量未竟议题，本文展现的仅仅只是冰山一角。从这个意义上讲，本研究可以是国内未来这方面研究的一个契机。另外，过去对老年福祉的研究的视角较为单一，本文通过构建多维度的老年福祉体系，为衡量老年人的福祉水平提供了一定的经验证据，也为政府在制定社会保障制度提供了有针对性的政策建议。

对于未来的研究，可以进一步丰富退休准备的内容、关注退休准备的影响因素、探求不同退休准备组合与老年福祉的关系以及讨论退休准备对老年福祉的影响机制，拓展丰富该领域的研究。

7.4 研究不足

1.老年福祉是一个内涵丰富的概念，学界对于老年福祉内容的界定和测量目前尚未达成一致。囿于数据的可得性，在构建老年福祉的评价指标体系时，对其内涵的覆盖还不够全面。

2.统计分析技术较局限。本研究对老年福祉水平的划分采取了 k 均值聚类分析法，在此基础上结合有序多分类 logistic 回归的统计方法，呈现了退休准备对老年福祉的影响。未能探求退休准备对老年福祉的影响机制如何，因此对本研究的分析存在一定的局限性。

3.由于二手数据的限制，本研究从原有问卷中挑选了部分问题和选项进行统计分析，在变量选取和测量方面难免存在“削足适履”的问题。这也导致了研究对退休准备指标的选取还不够丰富，退休准备的含义的多层次、多方面的，受原调查问卷设计所限，在变量选择时只将其首要退休准备引入研究，同时无法探求其它退休准备方式的影响。因此可能会使本研究的结果产生一定偏差。

参考文献

- [1] Adams G A , Rau B L . Putting off tomorrow to do what you want today: planning for retirement.[J]. American Psychologist, 2011, 66(3):180.
- [2] Aminzadeh K , Denny S , Utter J , et al. Neighbourhood social capital and adolescent self-reported wellbeing in New Zealand: A multilevel analysis[J]. Social Science & Medicine, 2013, 84(Complete):13-21.
- [3] Andrews, F M, Withey, S B. Social Indicators of Well-Being: Americans' Perceptions of Life Quality. New York:Plenum Press, 1976.
- [4] Bernard, Miriam. Robert C. Atchley, Social Forces and Aging: An Introduction to Social Gerontology, 7th edition, Wadsworth, Belmont, California, 1994, 607 PP. 39.50, ISBN 0 534 18948 2.[J]. Ageing & Society, 2008, 15(04):566.
- [5] Cantril H. Pattern of Human Concerns. New Brunswick, NJ: Rutgers University Press, 1965.
- [6] Christensen T, Barrett L, Blissmoreau E, et al. A practical guide to experience-sampling procedures. Journal of Happiness Studies, 2003, 4(1): 53-78.
- [7] Christine A. Price. Professional women's retirement adjustment: the experience of reestablishing order[J]. Journal of Aging Studies,2003,17(3).
- [8] Clark W A V, Yi D, Huang Y. Subjective well-being in China's changing society. Proceedings of the National Academy of Sciences, 2019, 116(34): 16799-16804.
- [9] Costanza R, Fisher B, Ali S, et al. Quality of life: An approach integrating opportunities, human needs, and subjective well-being. Ecological Economics, 2007, 61(2-3): 267-276.
- [10]Costanza R, Kubiszewski I, Giovannini E, et al. Development: Time to leave GDP behind. Nature, 2014, 505(7483): 283-285.

- [11]David G, Blanchflower, et al. Well-being over time in Britain and the USA. *Journal of Public Economics*, 2004,88: 1359-1386.
- [12]Deneve K M, Cooper H. The happy personality: A meta-analysis of 137 personality traits and subjective well-being. *Psychological Bulletin*, 1998, 124(2): 197-229.
- [13]Diener E, Emmons R A, Larsen R J, et al. The satisfaction with life scale. *Journal of Personality Assessment*, 1985, 49(1): 71-75.
- [14]Diener E, Napa Scollon C, Lucas R E. The Evolving Concept of Subjective Well-Being: The Multifaceted Na?ture of Happiness. Dordrecht, Netherlands: Springer, 2009.
- [15]Diener E, Oishi S, Lucas R E. Personality, culture, and subjective well-being: Emotional and cognitive evaluations of life. *Annual Review of Psychology*, 2003, 54(1): 403-425.
- [16]Diener E, Suh E M, Lucas R E, et al. Subjective well-being: Three decades of progress. *Psychological Bulletin*, 1999, 125(2): 276-302.
- [17]Diener E, Suh E. Measuring quality of life: Economic, social, and subjective indicators. *Social Indicators Research an International & Interdisciplinary Journal for Quality-of-Life Measurement*, 1997, 40: 189-216.
- [18]Diener E. Subjective well-being. *Psychological Bulletin*, 1984, 95: 542-575.
- [19]Dolan P, Peasgood T, White M. Do we really know what makes us happy? A review of the economic literature on the factors associated with subjective well-being. *Journal of Economic Psychology*, 2008, 29(1): 94-122.
- [20]Donaldson T , Earl R K , Muratore R M . Extending the integrated model of retirement adjustment: Incorporating mastery and retirement planning[J]. *Journal of Vocational Behavior*, 2010, 77(2):279-289.
- [21]Dorfman, L. T . Retirement Preparation and Retirement Satisfaction in the Rural Elderly[J]. *Journal of Applied Gerontology*, 1989, 8(4):432-450.
- [22]Dorling D. Injustice: Why Social Inequality Still Persists. Bristol: Policy Press, 2011.
- [23]Easterlin R A. Does economic growth improve the human lot? Some empirical evidence. *Elsevier Monographs*, 1974: 89-125.
- [24]Easterlin R A. Will raising the incomes of all increase the happiness of all?. *Journal of Economic Behavior & Organization*, 1995, 27(1): 35-47.

- [25]Feldman D C , Beehr T A . A three-phase model of retirement decision making.[J]. American Psychologist, 2011, 66(3):193.
- [26]Forgeard M J C, Jayawickreme E, Kern M L, et al. Doing the right thing: Measuring wellbeing for public policy.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Wellbeing, 2011, 1(1): 79-106.
- [27]Fretz, Bruce, Kluge R , et al. Intervention targets for reducing preretirement anxiety and depression.[J]. Journal of Counseling Psychology, 1989, 36(3):301-307.
- [28]G Mein,P Higgs,J Ferrie,S.A Stansfeld. Paradigms of retirement: the importance of health and ageing in the whitehall ii study[J]. Social Science & Medicine,1998,47(4).
- [29]Gabriela Topa and Juan Antonio Moriano and Marco Depolo and Carlos-Marí a Alcover and J. Francisco Morales. Antecedents and consequences of retirement planning and decision-making: A meta-analysis and model[J]. Journal of Vocational Behavior, 2009.
- [30]Gao W S, Smyth R. What keeps China's migrant workers going?: Expectations and happiness among China's floating population. Journal of the Asia Pacific Economy, 2011, 16(2): 163-182.
- [31]Gubler T , Pierce L . Healthy, Wealthy, and Wise Retirement Planning Predicts Employee Health Improvements[J]. Psychol, 2014, Forthcoming(9):1822-1830.
- [32]Gurd, B., & Or, F. K. H. (2011). Attitudes of Singaporean Chinese towards retirement planning. Review of Pacific Basin Financial Markets and Policies, 14(4), 671 – 692.
- [33]Gurin G, Veroff J, Feld S, et al. Americans View Their Mental Health: A Nationwide Interview Survey. Oxford,UK: Basic Books, 1960.
- [34]Haq R.Measuring human well-being in Pakistan: objective versus subjective indicators. Mpra Paper, 2009, 9(3): 516-532.
- [35]Hershey D A , Jacobs-Lawson J M , Neukam K A . Influences of Age and Gender on Workers' Goals for Retirement[J]. Int J Aging Hum Dev, 2002, 55(2):163-179.
- [36]Irving K . The Financial Life Well-Lived: Psychological Benefits of Financial Planning[J]. Australasian Accounting Business & Finance Journal, 2012, 6(4).

- [37] Kahneman D, Krueger A B, Schkade D A, et al. A survey method for characterizing daily life experience: The day reconstruction method. *Science*, 2004, 306: 1776-1780.
- [38] Kerk G V D, Manuel A R. A comprehensive index for a sustainable society: The SSI-the Sustainable society index. *Ecological Economics*, 2008, 66(2-3): 228-242.
- [39] Knight J, Gunatilaka R. *Aspirations, Adaptation and Subjective Well-being of Rural-urban Migrants in China*. London: Palgrave Macmillan, 2012.
- [40] Knight J, Gunatilaka R. Great expectations?: The subjective well-being of rural-urban migrants in China. *World Development*, 2010, 38(1): 113-124
- [41] Leandro - França, C., Murta, S. G., Hershey, D. A., & Martins, L. B. (2016). Evaluation of retirement planning programs: A qualitative analysis of methodologies and efficacy. *Educational Gerontology*, 42(7), 497 – 512.
- [42] Lee, W. K. M. (2003). Women and retirement planning: Towards the “feminization of poverty” in an aging Hong Kong. *Journal of Women & Aging*, 15(1), 31 – 53.
- [43] Liu Y Q, Zhang F Z, Liu Y, et al. The effect of neighbourhood social ties on migrants' subjective wellbeing in Chinese cities. *Habitat International*, 2017, 66: 86-94.
- [44] Lubben, J., & Gironda, M. (2004). Measuring social networks and assessing their benefits. In C. Phillipson, G. Allan, & D. Morgan (Eds.), *Social networks and social exclusion: Sociological and policy perspectives* (pp. 20 – 35). Hampshire, United Kingdom: Ashgate.
- [45] Maarten C.M. Vendrik, Geert B. Woltjer. Happiness and loss aversion: Is utility concave or convex in relative income? [J]. *Journal of Public Economics*, 2007, 91(7).
- [46] Maestas N . Back to Work: Expectations and Realizations of Work After Retirement[J]. *Journal of Human Resources*, 2010, 45(3):718-748.
- [47] Manpreet Ola and Roopa Mathur. Various Environmental Factors and Their Impact on Subjective Well-Being on the Older Adults[J]. *Indian Journal of Health and Wellbeing*, 2018, 9(1) : 89-92.
- [48] Michael Mink. Financial Preparation of Retirement Plans[J]. *ERC Research*, 2012.

- [49]Mock, S. E., & Cornelius, S. W. (2007). Profiles of interdependence: The retirement planning of married, cohabiting, and lesbian couples. *Sex roles*, 56(11 – 12), 793 – 800.
- [50]Muratore A M , Earl J K . Predicting retirement preparation through the design of a new measure[J]. *Australian Psychologist*, 2011, 45(2):98-111.
- [51]New Zealand: A multilevel analysis. *Social Science & Medicine*, 2013, 84(Complete): 13-21.
- [52]Noone J , O'Loughlin K , Kendig H . Australian baby boomers retiring 'early': Understanding the benefits of retirement preparation for involuntary and voluntary retirees[J]. *Journal of Aging Studies*, 2013, 27(3):207-217.
- [53]Noone J H , Stephens C , Alpass F M . Preretirement Planning and Well-Being in Later Life: A Prospective Study[J]. *Research on Aging An International Bimonthly Journal*, 2009, 31(3):295-317.
- [54]Oishi S, Diener E F, Lucas R E, et al. Cross-cultural variations in predictors of life satisfaction: Perspectives from needs and values.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Bulletin*, 1999, 25: 980-990.
- [55]Ostuw P and Pierron B and Yakoboski P. The evolution of retirement: results of the 1999 Retirement Confidence Survey.[J]. *EBRI issue brief*, 1999, : 1-26.
- [56]Oswald A J,Wu S. Objective Confirmation of Subjective Measures of Human Well-Being: Evidence from the U.S.A. *Science*, 2010, 327(5965): 576-579.
- [57]Pacione M. Urban environmental quality and human wellbeing: A social geographical perspective. *Landscape and Urban Planning*, 2003, 65(1-2): 0-30.
- [58]Pinquart M, Sørensen S. Influences of socioeconomic status, social network, and competence on subjective wellbeing in later life: A meta-analysis. *Psychology and Aging*, 2000, 15(2): 187-224.
- [59]Raymo, J. M. , S. Kikuzawa, J. Liang & E. Kobayashi. Family Structure and Well—Being at Older Ages in Japan[J]. *Journal of population Research*, 2008 (3) : 116—134.
- [60]Reitzes D C , Mutran E J . The transition to retirement: stages and factors that influence retirement adjustment.[J]. *Int J Aging Hum Dev*, 2004, 59(1):63-84.
- [61]Robert C. Social forces and aging: An introduction to social gerontology[M]. Belmont, CA: Wadsworth Publish Company, 2004.

- [62]Rubinstein, R. L., Lubben, J. E., & Mintzer, J. E. (1994). Social isolation and social support: An applied perspective. *Journal of Applied Gerontology*, 13(1), 58 – 72.
- [63]Russell, James A. A circumplex model of affect. *Journal of Personality & Social Psychology*, 1980, 39(6): 1161-1178.
- [64]Ryan R M, Deci E L. On happiness and human potentials: A review of research on hedonic and eudaimonic well-be-ing. *Annual Review of Psychology*, 2001, 52(1): 141-166.
- [65]Sargun Bedi and Gill Case. Cultural Impact on Happiness and Subjective Well-Being of Older Adults[J]. *Indian Journal of Health and Wellbeing*, 2014, 5(11) : 1273-1280.
- [66]Schellenberg G , Turcotte M , Ram B . Preparing for retirement[J]. *Canadian social trends*, 2005, 78(3):8-11.
- [67]Schwanen T, Atkinson S. Geographies of wellbeing: An introduction. *The Geographical Journal*, 2015, 181(2):98-101.
- [68]Schwanen T, Wang D. Well-being, context, and everyday activities in space and time. *Annals of the Association of American Geographers*, 2014, 104(4): 833-851.
- [69]Smith Courtland and Clay Patricia. Measuring Subjective and Objective Well-being: Analyses from Five Marine Commercial Fisheries[J]. *Human Organization*, 2010, 69(2) : 158-168.
- [70]Stiglitz J E, Sen A, Fitoussi J P. Report by the Commission on the Measurement of Economic Performance and Social Progress. <http://www.stiglitz-sen-fitoussi.fr/en/index.html>, 2013-06-04.
- [71]Sumner L W. Welfare, Happiness, and Ethics. Oxford, UK: Clarendon Press, 1996.
- [72]Taylor M A , Shore M F . Predictors of planned retirement age: an application of Beehr's model.[J]. *Psychol Aging*, 1995, 10(1):76-83.
- [73]Topa, G, Moriano, et al. Antecedents and consequences of retirement planning and decision-making: A meta-analysis and model[J]. *Journal of Vocational Behaviour*, 2009.
- [74]Van Solinge H , Henkens, Kène. Adjustment to and satisfaction with retirement: two of a kind?[J]. *Psychology & Aging*, 2008, 23(2):422-434.

- [75] Walker J. Changing Concepts of Retirement: Educational Implication[M]. Aldershot,England: Arena.1966.
- [76] Wang, Mo. Profiling retirees in the retirement transition and adjustment process: examining the longitudinal change patterns of retirees' psychological well-being.[J]. Journal of Applied Psychology, 2007, 92(2):455-74.
- [77] Watson D, Clark L A, Tellegen A. Development and validation of brief measures of positive and negative affect: The PANAS scales. Journal of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1988, 54(6): 1063-1070.
- [78] Yeung, Dannii Y . Is pre-retirement planning always good? An exploratory study of retirement adjustment among Hong Kong Chinese retirees[J]. Aging & Mental Health, 2013, 17(3):386-393.
- [79] “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二〇三五年远景目标的建议”节选[J].环境科学与管理,2020,45(12):1.
- [80] 2017 年我国养老保险行业养老金体系的三支柱模式分析 • 中国报告网 • 2017-10-31
- [81] 蔡亮,邓芸辙.从三支柱到五支柱——对世界银行养老金改革报告的评述[J].法制与社会,2008(02):279-280.
- [82] 曹仇晨. 对企业职工延迟退休年龄意愿的实证研究[D].西北大学,2017.
- [83] 曹娟. 积极老龄化视角下中国老年社会保障研究[D].南京大学,2013.
- [84] 曾通刚, 赵媛, 杨永春等. 中国老年群体脆弱性时空格局与性别协调发展特征——基于积极老龄化政策框架[J]. 地理科学, 2019, 39(12).
- [85] 陈明星,周园,汤青,刘晔.新型城镇化、居民福祉与国土空间规划应对[J].自然资源学报,2020,35(06):1273-1287.
- [86] 陈天勇,李德明,李贵芸.高学历老年人心理健康状况及其相关因素[J].中国心理卫生杂志,2003(11):742-744.
- [87] 陈曦慧.事业单位退休准备人员个案及退休准备教育研究[J].齐齐哈尔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6(01):61-63+77.
- [88] 陈肇男, 林惠玲. 家庭、社会支持与老人心理福祉:二十世纪末的台湾经验[M]. 台北: 中央研究院联经出版公司, 2015.
- [89] 单梦静. 基于可行能力理论的中国城乡居民多维福祉差异研究[D].南昌大学,2019.

- [90] 丁玲,吴炳义,郑晓瑛,李磊,王健.山东省老年人心理健康状况及影响因素分析[J].中国卫生事业管理,2014,31(12):948-951.
- [91] 杜鹏,李强.1994~2004年中国老年人的生活自理预期寿命及其变化[J].人口研究,2006(05):9-16.
- [92] 段白鸽. 动态死亡率建模与长寿风险量化研究评述 [J]. 保险研究,2015(04):35-50.
- [93] 付璐. 高龄农民工的养老困境及缓解对策[D].武汉大学,2017.
- [94] 桂世勋. 构建广义的老年人照料体系——以上海为例 [J]. 人口与发展,2008(03):78-83.
- [95] 郭爱妹. 心理学视野下的退休机制研究[J]. 高等学校文科学术文摘, 2016, 000(004):P.197-197.
- [96] 郭越昭.国外老人退休后都做些什么[J].新湘评论,2019(06):60-61.
- [97] 华蕾. 退休准备: 公众意愿与政府决策[D].西北大学,2016.
- [98] 黄甘霖,姜亚琼,刘志锋,聂梅,刘阳,李经纬,鲍宇阳,王玉海,邬建国.人类福祉研究进展——基于可持续科学视角[J].生态学报,2016,36(23):7519-7527.
- [99] 姜向群, 魏蒙, 张文娟. 中国老年人口的健康状况及影响因素研究[J]. 人口学刊, 2015, 37(2).
- [100] 姜向群, 刘妮娜. 老年人长期照料模式选择的影响因素研究[J]. 人口学刊, 2014 (1) : 16—23.
- [101] 蒋钰涵. 退休政策调整背景下临退休人员退休准备及影响因素研究[D]. 河北经贸大学,2020.
- [102] 解登峰,葛明贵,谢章明.老年人心理健康状态的影响因素[J].中国老年学杂志,2011,31(02):299-301.
- [103] 解垩. 中国老年家庭的经济脆弱性与贫困 [J]. 人口与发展,2014,20(02):67-75.
- [104] 李东方,江建.企业职工预期退休年龄及影响因素的实证研究——基于我国 10 省市调查数据的实证分析 [J]. 西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7,47(02):30-40.
- [105] 李金平,徐德均,邓克维.体育锻炼对老年人心理健康的幸福感影响[J].中国公共卫生,2006(04):390-391.

- [106]李路路,石磊.经济增长与幸福感——解析伊斯特林悖论的形成机制[J].社会学研究,2017,32(03):95-120+244.
- [107]李琰,李双成,高阳,王羊.连接多层次人类福祉的生态系统服务分类框架[J].地理学报,2013,68(08):1038-1047.
- [108]刘泓利,方远华,余林.退休规划的积极影响及影响因素 Positive Effects and Influence Factors of Retirement Planning[J].心理学进展,2016,006(003):P.299-304.
- [109]刘颂.老年精神生活:一个亟待关注的社会问题——老年人群精神生活现状的调查与研究[J].南京社会科学,2002(04):80-86.
- [110]刘义,刘于琪,刘晔,李志刚,邱婴芝.邻里环境对流动人口主观幸福感的影响——基于广州的实证[J].地理科学进展,2018,37(07):986-998.
- [111]栾文敬,杨帆,串红丽,胡宏伟.我国老年人心理健康自评及其影响因素研究[J].西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2,42(03):75-83.
- [112]骆为祥.中国老年人的福祉[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6.
- [113]潘影,甄霖,杨莉,龙鑫,曹晓昌.宁夏固原市生态保育对农民福祉的影响初探[J].干旱区研究,2012,29(03):553-560.
- [114]秦永超.老人福祉视域下养老福利多元建构[J].山东社会科学,2015(12):73—79.
- [115]秦永超.生态系统视角下农村留守老人福祉的影响因素[J].社会科学家,2019(05):51-59.
- [116]清华大学经管学院[1],&同方全球人寿联合课题组[2].(2018).2017中国居民退休准备指数调研报告.保险理论与实践,000(001),P.48-124.
- [117]沈可.中国老年人居住模式之变迁[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3. 79.
- [118]史培军,王静爱,陈婧,叶涛,周洪建.当代地理学之人地相互作用研究的趋向——全球变化人类行为计划(IHDP)第六届开放会议透视[J].地理学报,2006(02):115-126.
- [119]世界卫生组织.(2003).积极老龄化政策框架.华龄出版社.
- [120]田建国,庄贵阳,朱庄瑞.新时代中国人类福祉的理论框架和测量[J].中国人口·资源与环境,2019,29(12):9-18.

- [121]童磊,郑珂,苏飞.生计脆弱性概念、分析框架与评价方法[J].地球科学进展,2020,35(02):209-217.
- [122]王晨晓.退休人员退休生活适应过程研究[D].福建师范大学,2014.
- [123]王大尚,李屹峰,郑华,欧阳志云.密云水库上游流域生态系统服务功能空间特征及其与居民福祉的关系[J].生态学报,2014,34(01):70-81.
- [124]王金水,许琪.居住安排、代际支持与老年人的主观福祉[J].社会发展研究,2020,7(03):193-208+245.
- [125]王圣云.中国区域福祉不平衡及其均衡机制.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7.
- [126]王伟.高职老年服务与管理专业国家级教学资源库建设探索及经验分析[J].劳动保障世界,2020, No.564(08):70-70.
- [127]王曦影,吕道昱.个体与家庭的选择:京津中年女性专业人员的退休准备[J].华东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8,33(01):21-30.
- [128]巫强,周波.绝对收入、相对收入与伊斯特林悖论:基于CGSS的实证研究[J].南开经济研究,2017(04):41-58.
- [129]吴捷.老年人社会支持、孤独感与主观幸福感的关系[J].心理科学,2008(04):984-986+1004.
- [130]徐从德.教养方式对中国贫困青少年主观福祉的影响:自尊的中介效应分析[J].吉林广播电视台大学学报,2020(06):38-39.
- [131]杨莉,甄霖,李芬,魏云洁,姜鲁光,曹晓昌,龙鑫.黄土高原生态系统服务变化对人类福祉的影响初探[J].资源科学,2010,32(05):849-855.
- [132]叶敬忠,潘璐,贺聪志.双重强制:乡村留守中的性别排斥与不平等:gender exclusion and inequality in rural left-behind popula[M].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4.
- [133]于长永,何剑.脆弱性概念、分析框架与农民养老脆弱性分析[J].农村经济,2011(08):88-91.
- [134]喻安伦.社会角色理论碰撞[J].理论月刊,1998(12):40-41.
- [135]袁红兰.中国劳动力延迟退休意愿及其影响因素——基于中国劳动力动态调查数据的研究[D]. 2018.
- [136]张德馨.社区中年退休人员退休适应性教育研究[D].陕西师范大学,2012.

- [137]张丽瑶,王忠军.退休规划的研究现状和本土化发展[J].心理科学进展,2019,27(02):251-267.
- [138]张文娟,李树苗.劳动力外流背景下的农村老年人居住安排影响因素研究[J].中国人口科学,2004(01):44-51+81-82.
- [139]赵士洞,张永民.生态系统与人类福祉——千年生态系统评估的成就、贡献和展望[J].地球科学进展,2006(09):895-902.
- [140]赵文. 我国长寿风险分析[D].山东财经大学,2014.
- [141]赵晓航.社会经济地位、生活方式、社会支持与老年人健康水平——基于“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2010”数据分析[J].老龄科学研究,2014,2(05):63-73.
- [142]郑妍妍,李磊,刘斌.“少子化”“老龄化”对我国城镇家庭消费与产出的影响[J].人口与经济,2013(06):19-29.
- [143]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统计局. 中国统计年鉴[M]. 中国统计出版社, 2020.
- [144]朱盼玲,麦颖特.临退休群体角色调适的影响因素及应对策略——基于角色理论视域的研究[J].佛山科学技术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19,37(05):59-66.
- [145]左冬梅,李树苗,宋璐.中国农村老年人养老院居住意愿的影响因素研究[J].人口学刊,2011(01):24-31.

致谢

随着毕业论文写作工作的进展接近尾声，我的硕士研究生学习阶段也即将结束。回想在西南财经大学三年的研究生生涯，我有过期待与憧憬，也有过艰辛和迷茫，最终在这里收获了一段充实而精彩的时光。

首先，我要感谢我的导师严予若老师对本人的严格要求和学术培养。严老师严谨求实的学术态度、热情善良的处事方式和积极乐观的人生态度将是我一辈子的榜样。在她的谆谆教诲下，我没有虚度这三年光阴，不仅学到了理论知识，人生观和价值观也受到启发和影响。在导师的指导下，我得以完成痛苦却又充实的学术训练。在论文写作的过程中，从选题到构建逻辑框架、相关知识文献的认识与理解、再到文章每字每句的措辞表达，都包含了严老师的莫大心血，给予了我很大帮助，让我对老年学研究有了更深刻的认识。这一切知识财富，即便毕业了，也终生获益。

其次，感谢杨成钢教授、张俊良教授和王学义教授对本人理论知识的指导；感谢谭远发老师对本人统计方法的指导；感谢阳杨老师、贡布老师、孙炜红老师和杨帆老师对本人社会学思维的培养；感谢在论文开题和预答辩时各位指导老师提出的宝贵意见。通过各位老师各具特色的教学方式，我深入学习到了社会学的相关知识，拓宽了自己的专业视野。

最后，感谢三年来陪伴我的同学、朋友们，感谢他们在学习与生活中对我的关心和帮助，陪我一起面对挑战、收获快乐。感谢我的家人对本人的理解与支持。他们默默的鼓励和支持是我前进的动力，是我最坚强的后盾，是他们用信任和关怀让我拥有了战胜困难的勇气。

毕业不是学习的终点，而是人生的新起点。在未来的人生道路上，我将不忘研究生期间各位老师的悉心教导，更加勤奋努力，不断进步，让自己的人生更加有意义，成为一个对社会有贡献的人！